



紀念林書揚先生逝世一週年
永不消逝的驚雷：林書揚先生著述與實踐研討會

十年後
三月五日
下午五點
至
廿七點
二月一日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大樓二〇二室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
路一段一二九號

先會辦
揚員主
書委會
林行會
紀念實
生籌備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本書圖片來源：

- [封面] 改自何經泰先生作品
- [第一頁] 美聯社 (AP) 新聞圖片
- [第七頁] 故李文吉先生作品
- [第十一頁] 何經泰先生作品
- [第十三頁] 勞動黨提供
- [封底裡] 人間出版社提供

特此致謝！

緣起。

1911年，明治天皇獨裁高壓統治的年代。日本詩人石川啄木在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啟蒙後，作詩感嘆：他已經見到了社會主義思想靈光照見的新世界，但也焦慮地追問：那奔鳴的雷聲為何遲遲未來？

1934年，白色恐怖烏雲壓頂的上海。魯迅於五卅慘案紀念日，作詩《無題》。詩中名句「於無聲處聽驚雷」，表明了病中的魯迅儘管身處白色恐怖的無聲肅殺間，卻堅定地靜候著必到的革命奔雷。

1984年，身經日本殖民高壓統治和國民黨白色恐怖，台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書揚，假釋出獄。他懷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靈光和反殖民、反白色恐怖的鬥爭記憶，從囚禁他卅四年的煉獄，重回人間。面對台灣當時殺聲震天的反共秋野，他堅毅地秉持著冷澈的態度，與弱勢的勞動大眾一起發聲、抗爭，推動祖國和平統一，聯合國際進步力量反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宰制與軍事侵略。為了邁向那個「你好我也好」、愈見清晰的新世界，他用著述與實踐追趕著自己有限的生命——為的，就是讓革命的驚雷永不消逝！

林書揚。

林書揚(1926-2012)，台南麻豆人。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因全島性白色恐怖下的「麻豆案」而被秘密逮捕。自1950年5月至1984年12月假釋，繫獄三十四年又七個月，是台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書揚憑藉其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不改其志，出獄後再投身於台灣工人運動與民族再統一運動，特別是台灣愛國統一陣營的組織與發展。他先後參與發起了：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勞動人權協會、中國統一聯盟、勞動黨團體。2012年10月11日，林書揚走完了光榮的戰鬥的一生。他留下的著述（不包括譯文）超過1500頁，現編有《林書揚文集》四卷（人間出版社）。林書揚一生的實踐活動與思想結晶，正隨著時代推移而日益顯示出不凡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出生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時代的林書揚，自幼耳聞二十年代台灣農民組合與台灣文化協會等團體反抗日帝殖民統治的事跡，甚至接觸當時遺留下來的運動文宣。稍長，他通過曾是新文協幹部的族親啟蒙，學習社會科學，閱讀科學社會主義經典作品，從而接上了二十年代台灣人民左翼運動第一期之餘緒。1940年，林書揚進入台南二中（現台南一中）。面對日本殖民當局推行「皇民化運動」，他自覺抗抵學校的軍國主義教育。為迎接台灣回歸祖國，他在台灣光復前後加入台南青年組織「還中會」，在民眾之間普及關於祖國政情民情的相關常識。此外，林書揚也密切關注且學習正在中國大陸波瀾壯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發展、理論和經驗。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被國民黨當局認定參與幕後指揮工作，列入「黑名單」。1949年兩岸分斷之後，

林書揚在肅殺的五零年代白色恐怖之中遭當局逮捕而暫時中止其革命工作。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為主題的台灣人民左翼運動第二期，也就在遍及全島的五零年代白色恐怖中落幕。林書揚出獄後，參與並領導了台灣人民左翼運動第三期。他針對台灣社會的戰後階級結構和兩岸問題，提出了「追求民族和階級雙重解放」為口號的統左運動綱領，為了反獨促統運動的開展以及愛國統一陣營力量的發展和壯大，做出了卓越貢獻。

林書揚經歷了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人民高壓的殖民統治、經歷了台灣光復前後的劇烈轉折、經歷了國共內戰以及東西冷戰結構下長期的政治黑牢歲月。解嚴之後，他還參與了台灣人民左翼運動的再集結、參與了反對台獨分裂活動的嚴肅鬥爭。此外，林書揚也見證了蘇聯解體以來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低潮、新世紀世界人民反戰運動的崛起，世界資本主義金融危機大衝擊、「美國主宰下的和平」之嚴重內潰，以及兩岸關係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全新局面……如此等等。無論情勢如何發展，他總能觀照全局，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及其強烈而現實的歷史感，站在勞動人民和被壓迫階級的立場，為組織闡述立場並投入行動。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林書揚進一步發展東亞地區工運與反帝反戰運動的跨國連帶，參與並推動了「全亞洲反對美日侵略與宰制運動聯盟」(AWC)、「東亞冷戰和國家恐怖主義國際論壇」。林書揚認為，現階段的資本帝國主義乃是美國為首的、在二十世紀達到極致的跨國壟斷資本結合體；本世紀地球上最強大的武力，也掌握在組織性與破壞力均達到極致的資本帝國主義手中。為了工人階級乃至勤勞大眾的根本利益與福祉，林書揚強調勞動黨必須堅持統左兩大綱領，在此綱領指引下，持續推進反資反帝反戰運動；不但要反分裂、反軍購，更要促進兩岸和平發展、實現民族和平統一。一句話：勞動黨的時代使命，就是扶弱勢、禦強權；挺勞工、抗剝削！堅持這樣的時代使命，是林書揚向勞動黨提示的責無旁貸的任務。

林書揚總是自覺地顧大局、重團結、講原則、求真理。他將畢生精力奉獻給民族和解、中國統一，以及社會主義和人類解放的偉大事業。他扎根群眾、心繫人民。為替兩岸同胞求幸福、為替台灣民眾謀前途，林書揚奉獻了他所能奉獻的一切。其崇高信念、革命鬥志，以及人格典範，永遠值得後來者學習和效法。在他逝世周年的日子裡，我們舉辦首次紀念會懷念他！

研討會流程。

開幕致詞 吳榮元先生（台灣勞動黨主席、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總會長、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召集人）

第一階段 社會主義與民族再統一：林書揚先生的理論與實踐

13:00-13:20 林書揚的信念

報告人：呂正惠（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

13:20-13:40 《林書揚文集》對我的啟發：試論林書揚的基本思想

報告人：邱士杰（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13:40-14:00 階級、歷史與現實：從「新民主論壇」試論林書揚先生的民主觀

報告人：張鈞凱（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14:00-14:15 休息

第二階段 國際主義：林書揚先生的連帶思想與實踐

14:15-15:15 林書揚先生與「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研討會：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課題

報告人：徐勝（日本立命館大學教授）

口譯者：臧汝興（勞動黨副秘書長）

15:15-16:15 林書揚先生與東亞反帝運動

報告人：迫田英文先生（全亞洲反對美日帝國主義侵略與宰制聯盟（AWC）國際事務局代表）

口譯者：世新大學日文系 劉孝春教授

16:15-16:25 休息

16:25-16:55 綜合討論

16:55-17:10 結語：吳榮元先生

林書揚的信念

呂正惠

林書揚於一九五〇年五月被捕，其時他只有二十四歲，此後一直被關押了三十四年七個月，一九八四年年底才出獄。被捕時，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到底到什麼程度，我們現在已不可能知道。在三十多年的關押期間，他沒有自由閱讀的機會，思想只能隨著有限的客觀條件而成長。出獄以後，再過三年台灣隨即解除戒嚴令，在思想和行動上比較的自由。但作為假釋的政治犯，他也不可能像一般人那樣隨意行動。我個人對於林書揚的理解，大半來自於偶然的接觸和對他文章的閱讀。據我有限的體會，我覺得有幾點值得談一下。

林書揚在〈遲來的春天——談談《資本論》的解禁〉（一九九一）的末尾，全文引述了馬克思十七歲時的高中畢業作文，然後評述道：

這是馬克思十七歲時的高中畢業作文。我們不是說這篇稚氣未脫的文章也是天才作品。但每當我們讀它的時候，總覺得有件事深深打動著我們的心。馬克思的一生正如這篇作文所述，早在少年時代他已經思考著這樣嚴肅的問題：唯有追求社會完善的個人實踐，才是個人的完善過程。以十七歲少年的領悟，那是何等的純真的。而更可貴的是，護著這份童真，他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沿路把它珠玉般地鑲嵌在他的作品中。

在林書揚剛過世時，我的一個朋友跟我指出這一段，特別是「十七歲少年的領悟」是「何等純真」、「護著這份童真，他走到了生命的盡頭」這幾句。我的朋友說，其實這是林書揚夫子自道，他年輕的時候接受了一種理想，然後一輩子就「護著」它，一直走完他的一生。我聽了非常感動，而且知道他說對了。凡是曾經長期接觸過林書揚的年輕人，

都非常信服他，不是因為他有什麼豐功偉績，而是信服他的人格。他有一種無形的氣質，讓你由衷的尊敬。

他從馬克思主義學習到，「唯有追求社會完善的個人實踐，才是個人的完善過程」。在現代的世界，他用自己的生命史證明了，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是達到社會完善的、最重要的思想。他說：前者（民族主義）代表著一個血緣和文化的歷史共同體處在外來強權的控制下無法自主決定本身的發展方向，因而必須以整體團結的力量爭回主體性，這樣的自然要求。而後者則首先代表著共同體中佔有最大的人口比例，承擔著最基本的社會生存手段的生產責任的勤勞大眾對更公正更合理更進步的社會正義的當然要求。

對於處在這一世界現實中的台灣人應該如何做人，他是這樣說的：

我們的族群所背負的歷史問題，也不是用摔開、割斷的方式能夠解決的。正面面對著它、苦撐下去，這樣的態度才是時代良心。承受而不是逃避時代的痛——不論是病痛還是產痛，一心祈望終能超脫它，這就是一時代的良知良心。

從民族主義的立場來講，企圖把台灣和中國割裂開來，逃避民族責任；從社會主義的立場來講，因為自己已生活在小康社會中，因而忘掉世界上還有很

多勞動者生活在最低劣的條件下，這都是不應該的，不是一個有良知的人應有的態度。這就是林書揚一生的信仰。

當然，林書揚生活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他的理想幾乎沒有實踐的機會，被關在監獄中的一生最精華的那三十多年，只能在默默中忍受過去。然而，為了讓他的生命具有意義，他卻有他自己的「修練」之道。陳映真曾經談到，他在綠島時和林書揚某次在散步時的談話。監獄管理者規定，政治犯必須寫「自省自勉錄」，一般人都會寫一些雞毛蒜皮的瑣事交差了事，但林書揚卻認真的寫下他的所思所感。陳映真對他說，這樣恐怕會惹來無謂的麻煩，他沈默了一會，獨語似的說：

如果對自己最起碼的真實勇氣都喪失了，我要到那裡去得到力量，支持我渡過這漫長的二十五年，支持我渡過前頭漫無終點的囚人的歲月？

即使知道自己的理想沒有實踐的機會，他仍然堅持他所相信的。我的一個朋友還跟我說，林書揚出獄後，每當中國統一聯盟或勞動黨有集會或遊行時，他一定參加，而且確實執行分配給他的任務。有些老政治犯，會因為這些活動幾乎毫無社會影響力，而漸漸懈怠下來，但林書揚從未如此，他總是最積極、最熱心的態度參與。他相信他的想法是對的，他相信這些活動是應該舉辦

的，他就認真去做。他是為自己的理想而行動，他不是為實際效果而行動，他要為自己的想法而負責。因此，表面上看，林書揚的一生似乎沒有做出什麼事情，但實際上，他一直在行動。我的朋友的理解是非常正確的，一個人不能改變歷史條件，卻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渡過自己的一生，起碼這是對自己有意義。這就是思想者和行動者合一的林書揚。

林書揚自一九八四年年底出獄，至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一日深夜病逝，總共又渡過近二十八年的歲月。其間他參加了許多活動，寫了無數文章（他的文集超過 1500 頁），但他在台灣社會幾乎是默默無名。不過，他仍然存活在跟他接觸過、跟他學習過的當年的一些青年心中。其中兩個人曾給我寄來了他們個人的懷念文章，下面就引述一些。

有一個這樣說，他剛到綠島時，第一次見到從青春坐牢到白頭的老同學，便肅然起敬。他們之中有部份人或多或少染上憂鬱症，但更有一部份人，像林書揚一樣，大有要把黑牢坐穿的氣概，冷靜淡然，雖憂無懼。看到他們，我們也吃了定心丸，不久，我們有些新來的年輕人，逐漸變得跟他們一樣，在崇高的信仰中得到力量。林書揚給我們上的第一課就是超越，超越渺小的自我，擔當起歷史的使命。

他又說，經過長期的學習，他從林

書揚身上掌握了四個原則：第一，要有強烈的社會主義祖國意識，台灣絕不可與祖國分離；第二，凡事要有全局觀點；第三，要經常注重思想學習，要有策略觀念；第四，自覺擔負使命，要有崇高的獻身熱忱。他所說的這些，可以印証我們前面對他的評述。

另外一個談到，林書揚獨特的教導方式。有一次他問林書揚，「何謂國家？」林書揚回答，「國家是階級的統御及反統御行為。」問他何謂「法律」，林書揚回答，「法律是階級關係的界定」。林書揚的說法和他所學習的任何政治學教科書迥然相異，讓他突然「洞曉」了一切社會現象背後的真相。林書揚曾談到，莊孟候要他翻閱一位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教授編的社會科學辭典。從林書揚對這位年輕人的回答中，林書揚終於透過辭典中的社會學名詞的定義，同時也透過他一生的經歷，深深的了解到「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這一著名論斷。

由於從小聰明過人，又勤於學習，喜愛思考，林書揚對他極其艱苦的一生是了然於胸的。有一次，我跟他有比較長的交談機會，就想探問他如何涉案，如何被捕。沒想到他跟我上起歷史課來，從日據時代的農民組合運動，講到麻豆如何成為這一運動的中心；又從國共內戰講到韓戰後東、西兩大陣營如何形成冷戰格局，台灣又如何被美國劃入它的勢力範圍內。我可以體會他的意

思：他的一生只不過是這一歷史過程的小小的棋子，要談就要談大歷史，不要太在意個人的命運。

跟林書揚聊過天的人都有這樣的印象，他從不發牢騷，也從不訴說自己受過的苦難，但也絕對不是默默的承受歷史命運的播弄的人。他勇敢的躍入他所

認識到的歷史的洪流中，盡力去做自己認為該做的事，正如他自己說的，護著少年時代理想的童真，走過了他的一生

呂正惠
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
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林書揚與陳映真在五一節遊行的行列中

綠島方圓十六里，固然容不下我們的夢想凌雲
無奈那砂礫數畝的營地，卻緊緊地索住了我們的憂憤鄉愁萬斛
我們唯有相勉，在疲苦中各自和自己的怯意相拚鬥
在憤怒中我們彼此警惕於爆發的臨界點，恐懼時互相印證眉宇間的決心
在憧憬中相期相待，且相戒不在等待中耗損思想的鋒銳
縱然長夜逡巡也要留住晨曦的光與熱，日日、月月、年年，讓軀體老去
卻要挽住當年邁開第一步時的心悸

——林書揚

《林書揚文集》對我的啟發：試論林書揚的基本思想

邱士杰

若對我們將回大地，
而要求別離的沉默，
我只求一個四面迴響的瞬間！
為了馬埃士托拉山，
至少一次的激昂歌聲的爆烈回響！

前言

近百年間，由於日本殖民當局與國民黨法西斯連續而長期的白色恐怖鎮壓以及運動本身的弱小化，馬克思主義傳入台灣並形成組織化運動以來的多數理論文獻，始終不能在良好條件下由運動本身進行整理。某些情況下，甚至反而在鎮壓者手裡作為有篩選的「敵情」或「匪情」資料而得到匯集。¹因此，運動

內部進行的文獻徵集，往往都是一次難得卻必然偉大的工作。

現在出版的《林書揚文集》四卷本，正是八〇年代以來台灣社會主義統一派運動思想軌跡的一次重要見證。生於日據下台灣的林書揚先生（以下敬銜略），親見親聞二〇年代台灣社會運動遺緒，或得其傳聞。戰後經歷二二八事件、地下黨活動，以及三十四年零七個月的獄中「黨校」生涯後，林書揚形成了相對完整的、有體系的、關於階級解放與民族解放的理論觀點。正因為林書揚由此逐步錘鍊而成的理論修養與人格魅力，使他成為解嚴後社會主義統一派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雖然目前出版的《林

¹ 比方《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國防部

保密局）搜獲共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重要秘密文件》。

書揚文集》非其「全集」，仍有闕漏，但這套基於運動的問題意識加以編輯，並由運動本身整理出版的大書，無疑可以反映林書揚及其所經時代和運動的思想軌跡。——本文的目的，就是以現知的林書揚著作為對象，探討林書揚的基本思想。

本文從林書揚其思想中的兩個緊張性談起。

一、歷史與現實／現實與理想

林書揚基本思想中的第一個緊張性，存在於歷史與現實之間。為了現實鬥爭的需要，必須重建歷史；為了拯救歷史，則必須介入現實。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關係，體現在林書揚對「台灣人民左翼運動」所做的歷史分期：「台灣人民左翼運動的第一期，是二〇、三〇年代日據下的反帝鬥爭；第二期，是五〇年代國民黨統治下的人民民主運動；左翼運動的香火不絕如縷，一脈相傳至今，而有我黨的肇造。如此的歷史傳承，顯示了我黨肩負的台灣人民左翼運動第三期人民民主與反帝相結合的重大歷史任務。」（林書揚，1991）

林書揚出獄之後首先著手的工作是重建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運動史。主要是史料翻譯，其次是根據這些史料改寫成文，最後則是組織老運動家進行口述。而一九八九年全部竣工的《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

（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中譯本，就是包括林書揚在內的許多「老同學」——政治良心犯——辛勤勞動的代表性成果。

當政治氣氛逐漸寬鬆，而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也因一九九三年在六張犁發掘的大量墓群而得到社會關注之後，以林書揚為代表的許多老同學也開始著手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為對象的「翻案」運動。在台灣的條件下，他認為存在著「法律」、「政治」、「倫理」（思想）三種層次的「翻案」。前兩種翻案不以推翻現有體制為前提，第三種翻案卻是在社會主義運動通過奪取政權以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意義上被提出；林書揚視之為兩種「倫理」之間的對決。（林書揚，1988c）第三層次的翻案把白色恐怖平反問題鑲嵌在「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對決的現實鬥爭裡，不但把現實鬥爭的勝利視為拯救歷史的方式，並把現實鬥爭加以歷史化，通過歷史指出現實鬥爭所應堅持的價值與原則。

在台灣，「倫理」層次的翻案極其困難。由於中共在戰後國共內戰中提出「反官僚資本主義」口號，使四九年之際的國共內戰也具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決的性質（雖然反封建在當時被規定為比反資本主義更重要的任務），因此，這樣的性質不但遺傳到作為國共內戰之內在延續的民族再統一問題上，更體現在主張民族再統一的「老同學」們身上。

所以，凡是堅持民族再統一以及全世界社會主義前途的「老同學」們，他們所要求的「翻案」都超越前兩種層次而觸及「倫理」層次。但台灣社會對於「倫理」層次的翻案是敏感的。一九九四年，龍應台曾針對陳映真通過〈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一文而展開的「倫理」層次翻案提出強烈質疑，而林書揚當即批駁了龍應台。（林書揚，1994）龍應台與林書揚間的史觀鬥爭，就是「倫理」鬥爭的一次體現。

當然，今天在海峽兩岸大行其道的就是龍應台的那套論述。但這並不意味龍應台的論調更能說服人，而是反映出林書揚等「老同學」在當年所獻身的中國革命事業，如何在改革開放後的今天遭遇到比巨大成就還要難以估量的巨大挫折；而這樣的挫折正以革命史與價值觀的全面倒錯或危機為其內容。正如陳映真筆下的「蔡千惠問題」那樣——「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國坤大哥的赴死，和您長久的囚錮，會不會終於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陳映真，《山路》）——然而這樣的疑惑並不只是五〇年代以來的犧牲是否全然徒勞的問題，而是當下正繼承著這些犧牲者的道路前進著的後來人應該如何繼續走下去的問題，是擁有自己歷史的現實運動如何通向未來的問題。

為了處理運動如何通向未來的問題，林書揚在現實和理想之間出現了第

二個緊張性。這種緊張性可通過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型態》所說一段話來說明：「共產主義對我們說來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馬克思與恩格斯，1995：頁 87）這段話經常被視為馬克思從唯心的「人本主義」轉向「唯物主義」的標誌；而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異化」論正是其「人本主義」階段的代表。——林書揚思想中的緊張性表現在下列兩種「應然」間的鬥爭中：

1. 唯物主義的「應然」：林書揚力圖說明民族再統一運動**應該**是客觀上「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而不是主觀設想的「應當確立的狀況」或「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
2. 人本主義的「應然」：林書揚又試圖說明，即便「現有的前提」中存在著這樣那樣有利於民族再統一的可能，運動也**應該**把自身規定在最能避免機會主義、從而最有利於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之方向上前進；但既然存在著**應然**，也就存在著重新掉入「應當確立的狀況」或者「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的危險。

二、「反帝」是民族再統一運動具有現實性的第一根據

一九九五年，林書揚通過參與關於「中國意識／台灣意識／台獨意識」的討論²，而對引入討論之中的「異化論」提出批判。（林書揚 1995：頁 259-260）這個批判，可說是林書揚對抗「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的縮影。但從更大的角度來看，林書揚出獄以來所有關於民族再統一問題的論著，無不貫穿著這樣的對抗。林書揚並不認為「分」「合」有高下之分，不認為中國曾經統一將來就必須統一。他認為，統一或分離之正誤，只能從何者能夠符合歷史客觀趨勢的要求來判斷：「在原則上，不論是單一民族社會抑或多元民族社會，若其既存的內在結合原理，與客觀的未來發展原理相一致者，即使原為分裂者亦必趨向統一之局，而原已統一者，其凝聚力必將更趨堅強。與之相反，若其內在結合原理與發展原理相悖者，則已合者亦必趨向分裂。」（林書揚 1986a：頁 7）

雖然林書揚不認為「分」「合」有高下之分，卻認為不正常的、因外力而導致的「分離」必須克服——林書揚經常稱之為失土回復權——此即歷史如何在現實中仍具正義的問題。但「失土回復」之所以迄今意義不減，從而不得不在歷史的線索中伸張為正義，正在於當年造成分離乃阻礙失土回復的因素——也就是帝國主義侵略——從造成分離之初到

現在，都未曾消滅。因此，在帝國主義仍然把維持兩岸分斷作為介入手段的當下，通過民族再統一克服兩岸分斷，從而反對帝國主義，便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也因此，社會主義統一派的「民族主義必帶有強烈的反帝意識。特別是針對美日等直接干繫到兩岸分裂的國家抱持高度警惕與反感。」（林書揚，1990：頁63）

林書揚進一步指出，「台灣的現代化社會運動，一開始就是反帝運動」。「反帝」口號的長期存在，同時體現出當前運動的現實鬥爭性與歷史延續性，因此，當「瞭解了台灣史中的社會運動一開始就是反帝運動，而且是以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原則的結合為運動的指導理念之後，我們就不難進一步理解，為甚麼在當前的民族分裂局面下，台灣的民間統一運動仍然應該以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為思想基礎。」（林書揚，1992：頁73-74）

林書揚的思想提供這樣的啟示：雖然當前台灣的分離主義運動中也存在著極小部分的「反帝」主張，但這種「反帝」之所以必然無效乃至根本虛妄，正在於他們的「反帝」無一例外首先基於把「中國」定調為「帝國主義」而來。即便在規定出「中帝」之後也順便規定一下「日帝」與「美帝」的存在，也難掩這種論調通過「反日」「反美」從而「反帝」去掩護其反共反華的實質。且不說

² 這是因為陳昭瑛（1995a, b）論文而引發的論戰，有陳映真、王曉波、林書揚、陳芳明等人回應。

³ 在陳映真與戴國輝的 1984 年對談中，陳映真曾 11

這種論點多數從「改革開放」的資本主義後果乃至拒絕放棄武力解放去判斷大陸的「帝國主義性質」，最關鍵的是，因為這種論點全然拒絕歷史，所以拒絕承認兩岸至今仍然存在的對峙狀態乃是（台灣人民也投入其中的）中國國內戰爭未能徹底完成的後果。雖然這樣的後果，已然從大陸對台「武力解放」（這是保釣運動參與者大量左轉之後普遍認同的手段）與台灣人民「自求解放（然後統一）」兩者並舉的方式，轉化為不放棄「武力解放」下的兩岸「和平發展」，但是，僅從不放棄「武力解放」乃至改革開放下出現的資本主義化，便意圖藉此論證「中帝」的存在，則顯然忘卻了台灣人民曾經是「解放戰爭」之主體的歷史。

即便戰爭「解放」的意義與可能性大減、即便大陸的社會主義性質在改革開放之後遭遇重大挑戰、即便台灣人民的認同發生劇烈轉變，反帝國主義作為現實任務卻未曾消失。更重要的是，無論分離主義將多大的善意融於自身，只要帝國主義通過兩岸分斷以介入兩岸局勢的歷史條件持續不改，分離主義就永遠不可能把反帝貫徹到底，且必然在客觀上協助帝國主義。反帝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也不是社會主義統一派意圖以此一勞永逸的口號；但取消或遮蔽反帝，必然在現階段成為問題。因此林書揚才在讀完蘇新於一九四九年撰寫於香港的〈談台灣解放問題〉之後，感慨「五

十年前企以軍事解放達成反帝反封建的目標，五十年後成和平統一的目標仍需以反帝反獨為途徑，可見**歷史的大階段還未成過去**。人們的統左努力還是要持續推動下去。」（林書揚，2002b：頁159，黑體字為筆者所加）

此外，為了說明「反帝」的優先與持續性，林書揚在與謝里法和《民進報》的論爭中，特別討論了「反帝」以外的其他口號——主要是「反封建」——是否也能擁有優先性的問題。林書揚認為，只有當「封建」確實存在而且已經成為帝國主義利用的手段時，才必須反對。此外，像《民進報》那樣，不但在「反帝」之外進而提出「反封建」，還把所謂的「封建」等同於「中國文化」，則顯然是為了反對「中國文化」而拉出一個叫做「反封建」的稻草人而加以攻擊。雖然林書揚的反論認為「反帝」在台灣是更為重要的任務，但他還是肯定了「反封建」的本質性意義（這點於是又回歸到中國革命的基本認識上）——「反封建，則是一種自我超越，自我改造」。（林書揚，1987b：頁224-225）——林書揚的見解，令人想起伊藤虎丸沿著竹內好的話而提起的「通過『抵抗』即通過『自我執著』而獲得的『發展』」。（伊藤虎丸，2005：頁10-11）

三、資本主義「經濟主義」的現實性與陷阱

除了反帝之外，民族再統一運動的現實性其實還有很多根據。其中，林書揚特別注意他稱之為「經濟主義」與「民族倫理」的兩種統一論，並稱前者為現實主義，而後者為理想主義。所謂的「經濟主義」統一論，就是一種認為兩岸只要通過經貿交流，就可以在經濟整合中「促統」的見解。至於「民族倫理」統一論，則是林書揚基於他對中國社會主義之新民族主義紐帶的信賴而提出的見解。

「經濟主義」統一論的代表人物是陳映真。八〇年代初期，他與戴國輝的對談中，就曾經從台灣為什麼不能產生認同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來分析台灣分離主義的成因。陳映真提出民族資產階級的用意，就是在談兩岸能不能形成一個統一的經濟圈（他甚至假設了如果中共當初未能渡江，台灣能否與華南形成統一的經濟圈）。³到了陳映真也參與的《海峽》雜誌，則更直接把「社會主

義國家」（即指大陸）視為台灣中小企業可以投資的市場，藉此暗示兩岸應該進行經濟上的整合。⁴到了九〇年代，閱讀到韓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朴玄採著作的陳映真，乾脆提出一個極類似於朴氏「民族經濟論」的民族經濟圈論。⁵直至

⁴ 《海峽》的前三期始終對綱領尚未定型的民進黨抱有寄望，提出了結合反壟斷、爭取中小企業，以及「曲線」主張中國統一的「獻策」：「假使民進黨以包括中小企業的中智階級為其主體群，我們為民進黨借箸代籌，這篇尚未問世的政策宣言至少應為下列重大問題之解決提出理論性的詮釋……提出一套開發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市場的理論及行動綱領，當能博取中小企業的衷心支持。」「三、根據開拓社會主義國家市場的需要設計一套新的外交政策綱領，當比（民進黨）現行基本綱領戊項第四款「終止臺海兩岸對抗」的說法來得有號召力，也比行動綱領第一、第三項：與海峽對岸進行所謂和平競爭及重返聯合國來得實際。」（張大林，1987：頁34）

⁵ 開放台灣資產階級向大陸投資之後，陳映真曾提出這樣的解釋：「隨著台灣中小企業資本愈益深入地組織到在大陸開放改革過程中不斷膨脹的中國民族經濟中進行其循環，原本帶有買辦性、依附性——甚至非民族性和反民族性的台灣中小企業資本，勢將逐漸改變其性質，即逐漸增加資本的民族性。1991年底，原本代表了中小企業政治願望的民進黨，在將台獨條款正式列入黨綱的黨內爭議中，就具體出現過部份中小企業資本的躊躇與反對意見。」（陳映真，1992：頁21-37）陳映真還認為，隨著台灣資本向大陸投資的增加而使民族性相應增加，將來甚至可能在台灣的議會中出現遊說團體。而且兩岸經濟基礎的變化也將促使上層建築必須發生變化。（陳映真，1993：頁157-162）陳映真樂觀猜測：「台灣戰後經濟的現階段，離開了資本在大陸的循環是不可思議的」「台灣經濟不可逆轉地重編到開放改革後的中國民族經濟再生產構造，正在展開使我們目不暇接的兩岸經濟整合運動。」（許銘義，1993）受邀參加香港回歸典禮之後，陳映真提出了一些感想。他認為，台灣與香港的殖民地化是在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過程的構成部分，因此香港的回歸實是「中國半殖民地歷史終結的一部分，香港以『回歸』而不是『獨立』的形式完成了它的非殖民化。」從而也可以「看到經濟變化所起到的近於決定性的作用」。這個「近於決定性的作用」使香港在港資納入大陸經濟圈的過程中，承受了中英聯合宣

³ 在陳映真與戴國輝的1984年對談中，陳映真曾提出了一種猜想：如果1949年內戰的結果是國共劃江而治，台灣資產階級就有可能同長江以南的大陸資產階級共同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從而使台灣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可以在民族經濟圈內進行。戴國輝認為陳的看法「太樂觀」，「因為中國資產階級不夠成熟，世界史的胎動沒有來得及提供時間，讓他們找出『生機』」。雖然陳映真同意戴國輝的反駁，但他之所以有這種猜想，正是因為「台灣生活中有太多的實例說明了這實在是階級的問題，而不是什麼『民族』的問題。」雖然陳映真的「劃江而治」畢竟只是猜想，他卻盼望台灣的資產階級能在將來匯合於逐漸開放的大陸經濟之中，成為民族經濟體的一部分，從而逐漸解消台灣資產階級的台獨屬性。（陳映真與戴國輝，1988：頁151-152）

進入二十一世紀，陳映真（2000）才另外提出「兩岸無產階級聯合論」這樣的新見解。

雖然林書揚曾對「經濟主義」統一論表達某種妥協，但根本上，林書揚認為經濟主義是危險的；貌似促統，實則未必。早在一九八六年，林書揚便在〈有關反壟斷同盟的幾點意見〉文中指出，台灣的壟斷資本有可能因為兩岸和談乃至三通帶來的經濟整合而得以存活，從而使這種貌似促統的經濟契機轉而成為台灣「壟斷體制的延命策」；這樣的遠景容易為民族再統一造成障礙。（林書揚，1986b）林書揚在後續文章中更不斷指出，經濟主義可能因為完全無益於工人階級的生計，反使他們無法認同統一：

「資本家的熱衷和工人的離心是否變成極化現象，則無非是統一前途的一種隱憂。蓋純資本主義的統一動機即使在法理上的統一局面營造成功之後，也仍然是潛在的不穩因素。」（林書揚，1992：頁86）兩岸開放二十多年來的歷史，可說完全證明了林書揚關於「經濟主義」弊病的論斷。⁶

言、六四、彭定康政改方案的衝擊。對於台灣而言，「如果和大陸的經濟聯繫越來越成為台灣財富和生活發展不可缺的因素；如果大陸的發展和繁榮越來越不可忽視，台灣經濟的歸趨將如何影響於精神、政治和意識的問題，在香港回歸之後，勢將成為眾目的焦點。」並認為，香港回歸將給台獨帶來挑戰，因為香港殖民地化的歷史比台灣長，卻沒有出現香港民族論。（陳映真，1997：頁134-140）陳映真民族經濟圈論的來源，可參見朴玄埰（1990：頁123-141）。

⁶ 林書揚：「經濟非唯一的交流部門，其他文化、學術等部門的交流也有促進統運的意義。但這些

林書揚對「經濟主義」的批判，在改革開放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並進深化

範圍的交流所能發揮的社會影響比較屬於靜態，不具急迫性，也不易凝結成物質力量對決策層形成有效壓力。這類柔性活動反而往往變成執政黨應付或軟化人民的強烈要求的障眼法。」「最大的問題在於台灣的廣大勞工群眾被排除在資本掛帥的兩岸互動形勢之外。為了鼓勵台灣資本家的轉投資，台資優待辦法訂出了許多條，但總人口中最大比例的台灣勞工則非但在兩岸經濟交流中無從參與，反而往往在資方結束原地營業時遭受到資方倒債，失業更不用說。此外台灣勞工還面臨大陸偷渡勞工的競爭威脅。……」「台灣的勞工群眾在兩岸經濟交流的熱潮中所遭到的生活上、意識上的衝擊甚至挫折是很現實的。……」「因為台灣資本主義的後進性，使農村階級結構的轉移分化不夠徹底，跨產業的低熟練或非熟練工人反而對高剝削率具有較大的承受耐性。再加上長達38年的軍事戒嚴，使台灣勞工對現體制的抗爭意識至今仍然消極。特別是對政治層次上的問題，認識低關心亦低。對勞資間的矛盾也只是透過生活體驗而來的感性反撥，而少有理性層次上的制度批判。至於關係到台灣未來的統獨問題，多數勞工傾向於保留判斷；而他們的判斷標準，也必定是以現實利益上的衡量為主。」「資方的大陸轉投資熱潮，附帶地導致各地的關廠事件，而勞方除了在上生活遭到失業的衝擊外，還會遇到思想上的困惑。如：中國走了四十年的社會主義道路後仍要借重資本主義的作法，究竟是社會主義優越，還是資本主義優越？又，統一後一國兩制下的台灣仍然是個資本主義社會，那麼台灣勞工階級的位置如何，有何改善的可能？」「像這樣的疑問，如能在一定的認識水平上進行理性討論，倒不算是難題。但工人們的素樸觀念不容易接受和他們的感性認識有距離的說明。還有，台獨運動年來也有意強化他們的工運部門。他們看準了大陸經改中的資本主義要素和兩岸交流中的資本主義要素都把台灣勞工疏外在統運行列之外，認為台獨運動大可以和勞工運動相結合。」「如果台獨運動得以利用勞工運動的成長來彌補中小企業因大陸投資熱而減低對民進黨的支持，在策略上還是有它的可行性。他們的作法將是：把民進黨一向的策略重點稍作修改，將民主化改革的內容擴及到勞工權利的提高甚至經濟民主，再把它和台灣獨立的最高理念緊密結合，讓台灣意識涵蓋台灣工人意識。一方面針對當前大陸的優待台資辦法提出尖銳批評，指說：『只歡迎資本家，不顧工人死活』，用心鼓起反中國情緒。」（林書揚，1992：頁84-86）黑體字為筆者所加。

的當下尤具挑戰意義。比方，某些分離主義右派明明只是為了反對兩岸經濟整合（及其可能導致的政治後果），卻把高度拉升到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從而擺出以左掩護右的姿態。這種左右混亂的思想狀態，不正是「經濟主義」負面後果的最佳體現？為了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該如何直面並化解「經濟主義」派生的各種後果？

四、堅持階級論、堅持工人階級運動優先性

林書揚之所以如此關注工人階級對於民族再統一問題的態度，一方面在於林書揚把工人階級的命運擺在更優先的地位，這體現出他對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堅持；另一方面，林書揚清楚認識到：八〇年代初期以來的種種分離主義論述（無論是台獨還是獨台），都急於形成一種把自己區隔於中國之外，乃至區隔於國民黨政權之外的「整體論」；而這種「整體論」以取消階級差別（等差別）為前提。在「台灣結／中國結」論戰期間，這種「整體論」以「台灣一千八百萬人論」為代表，當時的陳映真曾以階級論批判了這種意圖取消「一千八百萬人」內部之階級矛盾的論述。⁷到了解嚴前

⁷ 就現實論述來說，陳映真主打「一千八百萬人論」泯滅階級差異這一點。『台灣人民』有一千八百萬，總要有階級構成之分析吧！不同階級的『台灣人民』，有絕不相同的政治、經濟利益。」並指稱「一千八百萬人論」以及與之結合的「自決」口號，正是台灣資產階級（無論省籍）將自己的利益「強加在」「一千八百萬人」身上、要求「一千八百萬人」買單的口號。（陳映真 1988a：頁 37；1988b：頁 47）

後，這種「整體論」則以「反壟斷聯盟」論以及「民間社會」論（或稱「民間哲學」）為代表。⁸前一種論述主張階級聯合，後一種論述則遮掩階級鬥爭。而此時首先跳出來批判兩者的，正是林書揚及其主辦的《前方》雜誌。

反壟斷聯盟論反對從正面的口號（如「民主」）劃出統一戰線，因為「『反壟斷』優於『民主』，因『民主』一旦延伸於社會，經濟上即形扞格不入。」所以該論主張從「對立面界定盟友」，藉此「團結新壟斷體制以外的一切社會勢力，主要是工農大眾與中小企業主，組成一條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林書揚則認為，反壟斷聯盟論錯估台灣各階級的代言人以及各階級間的關係（比方高估民進黨建黨背後以壟斷資本為背景），而中小企業主與廣大台灣工農之間的深刻矛盾也難以使兩方在「反壟斷」的口號下形成統一戰線。但跨階級統一戰線仍是可以的，除非是以「工農聯盟」為核心的中國統一運動。（林書揚，1986b）

在批判反壟斷聯盟論的延伸線上，林書揚批判了「籠統地把凡不屬公權力結構，而成為公權力行使對象的一切團體和個人，都歸納為民間社會」的民間社會論，因為「官民對立因而不是社會

⁸ 「民間社會」論的論述史和批判可參見：機器戰警（1991），李丁讚與吳介民（2010：頁 393-446）。

內在矛盾的唯一表現，也不是最大表現，而只是社會內在矛盾的衍生現象之一，最根本的社會矛盾，是統攝官民矛盾的階級矛盾。」（林書揚，1987a：頁26-27）

從今天來看，林書揚當年的批評堅持了階級論的原則，也為日後的「民間社會」批判打響了第一槍。當然，其批判的路徑不同。此外，又由於民間社會論以公營事業民營化（以「拍賣中華民國」等口號為代表和先導）為訴求之一，而這樣的訴求又相當體現了新自由主義在台灣的客觀要求。因此林書揚當年的批判，也成為台灣的新自由主義批判的前驅之一。

必須承認，林書揚反對無條件的統一戰線的立場引起許多值得討論的爭議。但可肯定的是，以階級論為基礎的、強調工人運動具有指導性地位的「工農聯盟」論，是林書揚一切思想的原點。

總的來說，拒絕從「對立面界定盟友」的林書揚不僅僅直接突出了運動所需依靠的階級，更反映他認為運動除了「反對」敵人之外，還須從正面提出自己的主張，如此才能擁有主體性。正因如此，民進黨於兩千年之際上台後，林書揚基於民進黨政權仍然代表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判斷，指出「當代台灣的兩種不同形成期的資產階級以政權交替為契機，逐漸走向合流」，「並沒有出現形

式民主實質化的進一步作為。到了政權交替實現，掌權者由官僚資產階級的政治代理人轉為新興本土資產階級的受託人，人民在各方面的民主權利並沒有實際的改善。」（林書揚，2002a）因此林書揚以「新民主運動」為口號，從正面提出反對壟斷資本依然專政的局勢；而「新民主運動」也因此成為林書揚晚年親自領導的最後一場「當代民間政治批判運動」。

五、社會主義「民族倫理」的理想性與危機

也正在是堅持階級論、堅持工人運動優先性、堅持工農聯盟論的立場上，林書揚提出了「民族倫理」論。他認為，民族再統一之所以必須依靠工農——特別是工人階級——的原因，正在於中國革命形成了「以社會主義為內容的中國新民族主義的韌帶作用」。（林書揚，1986b）「在一定的世界觀規定下的民族倫理說，有其本然的指導性和統攝性，能超越一時的、局部的逆行現象而指向終極的價值目標」（林書揚，1990：頁66），從而使台灣民眾出現民族與階級的雙重認同，克服「經濟主義」論弊病。⁹

⁹ 林書揚：「所謂工運與統運不可並行的論調，只是有意把台灣工運永遠壓低在初級的生活爭議階段上，斷定其為永不成長的侏儒運動，也把統一運動看成與人民大眾實際權益無關的，結構上層的權力推移。實則，工運之終必面向並掌握台灣社會的特殊課題，不能也不應迴避的課題——統一問題；統一運動之終必促進人民大眾經濟生活，特別是勞工出路的新機運，乃無可置疑的趨勢。」「台灣工人運動的目的在於勞工階級的解放。而台灣勞工階級，不也是中華民族的一構成

對林書揚來說，民族再統一運動與工人運動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在高度妖魔化統一派的台灣社會，在削弱民族再統一運動正當性的各種變因層出不窮的條件下，更只能通過深入台灣的群眾生活，只有堅持在以工人運動為主體的各種社會運動中從事**服務、了解、教育、組織，以及動員**，才能為民族再統一運動打下真正紮實的基礎。若聯繫到遠化罷工以來勞動黨在新竹等地堅持的工運路線及其近年重大成果，或許正可視為工農聯盟思想落實到在地實踐的證明罷。

然而，正如林書揚自己也意識到的，「民族倫理」論「因其高超性和不可避免的抽象性格，而不容易在運動中落實具體而實際的策略指導作用。」（林書

要因？且所謂嶄新的中華民族乃為具有階級解放的結構原理的民族主義。只要民族仍然是一種歷史的共同體，具有它的運動規律，民族主義運動和勞工運動，是同具解放運動的本質的。再說現實上沒有人主張直接以中國意識來推動工人運動。因為統運和工運畢竟不屬於同一個活動領域。但也不是絕對的異次元。中國意識的闡明可以在戰略層次上使台灣勞工運動找到現已存在但尚未被充分反映出來的歷史方位。使台灣勞工的局部觀點和本位觀點及早擴大超昇為現實基盤上（因為中國不是一個夢）的全局觀點。卻又不抵觸於勞工運動的國際主義原理（因為**中國新民族主義同時不抵觸於國際主義**）。」「為了近八百萬台灣勞工不至於被台獨所引誘，統左路線的勞工運動必須有力推動。那是階級和民族的雙重認同，也就是，勞工階級對資本主義剝削體制的批判和改造的立場（左），和中國民族從帝國主義壓迫下復權，重新發揮民族團結的創造力（統）的，兩種思想要素的高度統一。如何以群眾語言將此一原則傳播在人民大眾之間，應該是民間統運的努力重點之一。」（林書揚，1988a：頁 45；1988b：頁 53；1992：頁 76、86）黑體字為筆者所加。

揚，1990：頁66）再加上林書揚所重視的社會主義的「中國新民族主義」紐帶因為改革開放的資本主義化進程（這同時也是「經濟主義」的膨脹進程）而不斷在海內外削弱，從而衝擊了林書揚關於「大陸社會當前的結構原理大致上符合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發展原理」與「大陸社會以全民和集體共同佔有生產手段為基礎」等一系列判斷時，意圖以「民族倫理」作為民族再統一的根本基礎，就不免陷入「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的危險。因此林書揚認為大陸方面必須正視台灣工人階級因為改革開放下的「經濟主義」統一趨勢而出現的反認同問題，必須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¹⁰

其實林書揚對於大陸的資本主義化過程始終有著冷澈的現實判斷。以「三個代表」來說，林書揚就直接針對該論的生產力優先論提出反思。他的反思，實際上也是在為大陸的工農發聲。林書揚以大躍進提出的「多快好省」口號為

¹⁰ 林書揚提出解決方案如下：「一、應由有關政府機關做明確的政策宣示：凡台灣經營者提出新投資（在大陸）案要求審批時，核准條件中應包括一項不得在原經營地（在台灣）有未經依法清理的、以從業員工為對象的債務。二、將大陸勞工生活中的各種國家保障、共同福利及政治的、職場的各種民主權利規定等，向台灣做系列介紹。特別是有關生活實際面的，如居住、子女教育、醫療等項目，應是台灣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勞工群眾所最關切者。三、台灣勞工群眾對大陸現行經建，及未來一國兩制的統一方式所懷有的疑念，可經由兩岸交談或公開信等方式予以解釋，或舉辦兩岸青年工人對談，或由總工會向台灣數百萬勞工同胞提出問候和說明的公開信等。」（林書揚，1992：頁 86-87）

例，說明社會主義曾以這種標準界定生產力的先進性，從而，他技巧性地從多、從快、從好、或者從省，向當前所謂「先進生產力」提出衡量標準究竟為何的提問，從而直問落後生產力中的工人在生產力等級化的條件下將如何被代表的問題。此外，他也從生態保護的觀點，向「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提出了商榷。（林書揚，2001：頁143-150）——林書揚從左翼出發的提問非但無損於統一派的正當性，反而證明了統一派與社會主義者必須真正合一才能擁有批判性！

六、倫理與政治——代結語

為了克服「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的統一論，林書揚從帝國主義如何繼續維持兩岸分斷的「現有的前提」出發，論證反帝就必須實現民族再統一、論證民族再統一運動就是「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但當林書揚面對著同樣具有高度現實性的「經濟主義」統一論時，林書揚卻因著眼於「經濟主義」趨勢為台灣工人階級帶來的反認同，而主張具有「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之危險的「民族倫理」論。林書揚的矛盾不但是台灣社會主義統一派始終面臨的難局，更是中國革命的歷史成果與社會主義的前途能否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得到維護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林書揚的矛盾，恰恰是中國社會主義正在歧路上的反映。

雖然林書揚的「民族倫理」論因為改革開放的成就與挫折，而在當前遭遇了巨大的挑戰；但經常被他歸之於「倫理」範疇的社會主義以及相應產生的新型態的民族主義，卻提示了新的政治的可能。或者說，提示了一種同「去政治化的政治」相對抗的立腳點。長期以來，許多「左翼」所謂的「政治化」，往往以取消原則為前提，導致林書揚意圖通過「倫理」這個哲學字眼而表達的原則從「政治」中割離出去，成為一般的世俗的、看到哪邊人多就跑過去、只要能搞人就被認為有效的「政治」。這種「政治」貌似現實，實際上卻失去了政治的主體性與判斷力。雖然，拒絕在「政治」與「倫理」之間畫線，產生了很多困難，卻也因為避免機會主義、堅拒任何模糊地帶，從而保持了左翼運動政治的可能性。

在林書揚因病而瀕於不能動筆的二〇〇九年五一節前夕，他親自組譯並撰寫了一本關於五一節的小冊子。（勞動前線，2009）他在這個小冊子中提出了「社會主義是代案」（Socialism is Alternative!）的口號。如所皆知，世界社會論壇曾提出「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並因為這個口號，而招致反對派「孟買抵抗2004」指摘其運動目標不該是機會主義意味濃厚的「另一個世界」，而應該直指「社會主義」。¹¹林書揚將「社會主義」

¹¹ 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 WSF）與

同「代案」聯繫起來的提法，顯然與反世界社會論壇者有類似的思路。其實兩者之間並沒有任何聯繫，但只要聯想到林書揚拒絕只從「對立面界定盟友」，便不難想像他為何直指「代案」為社會主義——正如林書揚眼中的「反壟斷」必須直指「民主」，而「反帝」必須直指「民族」一樣。

還記得羅莎·盧森堡所說的嗎？她說，未來取代資本主義的若非「社會主義」，就只能是「野蠻」。林書揚的思路可說提示了進一步的問題：如果不能在實踐與理論中直指未來為社會主義，而只是空提「代案」的可能，真正成為「代案」的，將真的只能是野蠻。而林書揚向著台灣、向著全中國、向著全人類發出的警號，就是現在立即聯合起來，要為社會主義而鬥爭——

被壓抑的諸國民！

快睜開眼睛看，

到處都有聳立雲端的，

馬埃士托拉山！

——聶魯達詩，林書揚譯，〈為了奉獻馬埃士托拉山的歌的一刻！〉¹²

反對派「孟買抵抗 2004」(Mumbai Resistance-2004)兩造之間的對立可參見：Immanuel Wallerstein(2004)。

¹² 這是林書揚停止寫作前的最後作品之一，馬埃士托拉山即當年古巴革命隊伍的基地。(勞動前線，2009)

徵引書目（拼音序）

陳昭瑛(1995a)。〈論臺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中外文學》，第23卷第9期(台北)。

陳昭瑛(1995b)。〈論臺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海峽評論》，第51期(台北)。

陳映真(1988a)。〈共同的探索——為台灣前途諸問題敬覆永台先生〉，收錄於陳映真，《美國統治下的台灣》。台北：人間出版社。

陳映真(1988b)。〈追究「台灣一千八百萬人」論〉，收錄於陳映真，《西川滿與台灣文學》。台北：人間出版社。

陳映真(1992)。〈祖國：追求·喪失與再發現——戰後臺灣資本主義階段的民族主義〉，《海峽評論》，第21期(台北)。

陳映真(口述)(1993)。〈現在是重大反省時刻！——陳映真總評國共兩黨、民進黨及臺獨〉，《財訊》，第132期(台北)。

陳映真(1997)。〈歷史召喚著智慧和遠見——香港回歸的隨想〉，《財訊》，第186期(台北)。

陳映真(2000)。〈序〉，收錄於杜繼平，《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統獨問題的上下求索》。台北：人間出版社。

陳映真與戴國輝(1988)。〈「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戴國輝與陳映真於愛荷華對談〉，收錄於陳映真，《思想的貧困》。台北：人間出版社。

Immanuel Wallerstein(2004), "[Commentary No. 130, Feb. 1, 2004] The Rising Strength of the World Social Forum."

- <http://www2.binghamton.edu/fbc/archive/130en.htm>. (accessed November 11, 2012).
- 伊藤虎丸(2005)。〈亞洲的「近代」與「現代」——關於中國近現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收錄於氏著，孫猛等譯，《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機器戰警(甯應斌)(編)(1991)，《台灣的新反對運動——新民主之路》。台北：唐山出版社。
- 勞動前線(編)(2009)。《華爾街金融海嘯怒濤，全世界勞動者的怒吼！2009年五一國際勞動節特刊》。台北：台灣勞動黨。
- 李丁讚與吳介民(2010)。〈公民社會的概念史考察〉，收錄於謝國雄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群學出版社。
- 林書揚(1986a)。〈民族問題的本質與現象(1986年2月)〉，收錄於林書揚(2011)。
- 林書揚(1986b)。〈有關反壟斷同盟的幾點意見(1986年10月)〉，收錄於林書揚(2011)。
- 林書揚(1987a)。〈黃昏的故鄉——從〈官僚主義的黃昏〉談民間哲學的迷思與欺罔(1987年6月)〉，收錄於林書揚(2011)。
- 林書揚(1987b)。〈台灣人的「主體性」——讀《民進報》編輯部答覆文有感(1987年6月)〉，收錄於林書揚(2010b)。
- 林書揚(1988a)。〈馬鳴風蕭蕭——敬答《民進報》周刊社論(1988年3月)〉，收錄於林書揚(2011)。
- 林書揚(1988b)。〈如果獨立的台灣只是一夕的夢——對〈如果中國是一個永遠的夢〉的回應(1988年7月)〉，收錄於林書揚(2011)。
- 林書揚(1988c)。〈翻案的道理、道理的翻案(1988年7月)〉，收錄於林書揚(2010b)。
- 林書揚(1991)。〈關於勞動黨黨綱修訂的報告(1991年3月29日)〉，收錄於林書揚(2012)。
- 林書揚(1990)。〈台灣民間統運中的民族倫理和經濟主義(1990年6月)〉，收錄於林書揚(2011)。
- 林書揚(1992)。〈台灣民間統運與大陸經建——在「海峽兩岸關係與和平統一研討會」的論文(1992年6月)〉，收錄於林書揚(2011)。
- 林書揚(1994)。〈回應龍應台的〈誰是官兵誰是強盜〉一文(1994年7月25日)〉，收錄於林書揚(2010b)。
- 林書揚(1995)。〈審視近年來的台灣時代意識流：評陳昭瑛、陳映真、陳芳明的「本土化」之爭(1995年6月15日)〉，收錄於林書揚(2010b)。
- 林書揚(2001)。〈有關七一講話中的生產力論〉，收錄於《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1年·秋冬：因為是祖國的緣故」。台北：人間出版社。
- 林書揚(2002a)。〈為什麼搞「新民主論壇」(2002年6月19日)〉，收錄於林書揚(2012)。
- 林書揚(2002b)。〈重讀蘇新〈談台灣解放問題〉(2002年9月)〉，收錄於林書揚(2011)。
- 林書揚(2010a)。《林書揚文集》，第1卷「回首海天相接處」。台北：人間出版社。

林書揚(2010b)。《林書揚文集》，第2卷「如何讓過去的真正成為過去」。台北：人間出版社。

林書揚(2011)。《林書揚文集》，第3卷「有了統一才能自決」。台北：人間出版社。

林書揚(2012)。《林書揚文集》，第4卷「勞動者，團結起來！」。台北：人間出版社。

馬克思與恩格斯(199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朴玄埰(1990)。〈統一論としての自立的民族經濟の方向〉(梁官洙譯)，收錄於本多

健吉監修，《韓國資本主義論爭》。東京：世界書院。

許銘義(整理)(1993)。〈臺灣前途和兩岸關係：紐約鄉情座談會紀錄〉，《海峽評論》，第33期(台北)。

張大林(1987)。〈民進黨何去何從？——評民進黨的基本綱領〉，《海峽》，第3期(台北)。

邱士杰

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愛鄉愛國改造社會死而後已；民主統一走向富強壯志未酬

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前者代表著一個血緣和文化的歷史共同體處在外來強權的控制下無法自主決定本身的發展方向，因而必須以整體團結的力量爭回主體性，這樣的自然要求。而後者則首先代表著共同體中佔有最大的人口比例，承擔著最基本的社會生存手段的生產責任的勤勞大眾對更公正更合理更進步的社會正義的當然要求

——林書揚

階級、歷史與現實： 從「新民主論壇」試 論林書揚先生的民主觀

張鈞凱

一、前言

處於東亞樞紐的台灣地區，自解嚴之後在政治制度上採行西方的代議式民主與多黨競爭選舉，行之多年，而且親歷了屬於自身脈絡特有的問題與矛盾，對於何為「民主」、如何實踐「民主」應有更超越的宏觀視野。新世紀以降，台灣經歷了兩次政黨輪替，西方國家讚揚台灣的民主成就，而台灣民眾則自豪於民主發展在中國大陸之上，但實際面臨的卻是民主制度之下，政治、經濟與社會各領域的運作困境，更多的民主、更多的選舉，顯然已非萬靈解藥。

林書揚先生以其學識、素養與行動，成為台灣社會運動的實踐者，以及社會主義統一派重要的領導者與理論家。早在民進黨執政初期，林書揚於 2000 年擔任勞動人權協會會長，自 2002 年糾集包含女性勞動者權益促進會、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台灣反帝學生組織、《勞動前線》雜誌社與勞動黨社運部等相關運動團體，成立「新民主論壇」(New Democratic Movement Forum)，歷經 6 年的時間，至 2008 年年底共舉辦 28 次的研討會或討論會。在自由主義式民主

的發展走入困局之際，林書揚及其號召成立的「新民主論壇」或許能提供更多思考上的刺激與啟發。

二、資產階級民主的本質

林書揚在 2002 年完成的〈為什麼搞「新民主論壇」〉一文，形式上可視為新民主論壇成立前的宣言或是緣由，但實質上是林書揚有體系產闡述他對當代民主體制的理解與批判的關鍵文獻。

（一）相應於西方社會歷史條件的民主形式

西方當代民主的出現，根源於西方社會的歷史條件。林書揚指出，17、18 世紀產業革命後總人口的增加，市民階級的人口大幅超越了少數掌握特權的貴族人口。為了向封建統治者奪取政治權力，以掌有經濟實力的資產階級為主導，聯合其他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等形成多數派，發動市民革命進行政治權力鬥爭。這場實質上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民主」革命，最終導致原來掌有政治經濟權力的貴族階級瓦解，資產階級形成新的支配者，而原來與資產階級合作的農民與工人卻仍然維持了被支配者的地位。

做為反對封建統治革命的產物，同時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西方的民主實質上即資產階級式的民主，因為「集體中的個體必定有先天、後天的不同優劣條件，因而在其參與權、決定權方面

不可能完全一律」。運作上必然出現林書揚所指出的困境：「在政治範圍內導致於制度的，或者運作型態方面的**結構性不平等**，造成了形式民主中的實質的反民主，或程序民主中的實質歧視時，意味著著名目權利下的無權狀態的存在，將不僅導致內部體制的不穩或衝突，也使得集體的發展嚴重受阻」，最終導致一般的勤勞大眾，形成「政治上受統御，經濟上受剝削的階級階層的混合體」。西方資產階級式民主，不只鞏固原有結構的落差與歧視，也阻礙了多數人民的實質參與，當然也就會激化社會內部的矛盾。

（二）民主成為壓抑機制

西方民主內部的資產階級鬥爭的本質，再加上資本主義運作邏輯，隨著歷史的發展，特別是美國在戰後成為「單極超霸」的國家，「民主」成為其表面的裝飾物，真正的目的是以民主做為一種「壓抑機制」，達到干預、介入與操縱其他國家的結果。林書揚指出，民主被帝國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政權貼上「普世價值」等「絕對善」的標籤加以利用，但表現而出的卻是反民主的「強權即公理」的「逆流」，民主遭到誤用、惡用與濫用。林書揚深刻且尖銳地體認到，西方形式民主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者之間所存在的緊密關係，尤其是戰後共同在臺灣社會與兩岸關係間發生作用，從而急迫地主張「民主的批判運動此刻應該進入時代意識的中心位置」。

（三）台灣民主發展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台灣的民主體制，基本上移植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形式，因此台灣的民主發展過程，不只承襲了西方形式民主的各種流弊與困境，與此同時又基於台灣的政治條件，表現出台灣民主改革運動及其產物的特殊性。林書揚明確地指出，台灣民主改革的背景，就是以本地新興資產階級為主體，挑戰國民黨所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及其表現而出的威權統治。台灣統治階級的結構變化，僅止於不同的資產階級之間的更迭，從而壓縮了實質民主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隨著本地新興資產階級的掌權，台灣社會內部的矛盾還表現在勞資問題與兩岸問題，使得原有的形式民主更顯得岌岌可危。實際承擔社會生產責任以及社會矛盾惡果的勤勞大眾，反而因為資產階級民主形式必然帶來的困境與限制，只能在選舉期間被動員投票，手中握有「不少名目權利，卻只有貧乏的實質權利」。

（四）擺脫民主迷思、促進社會變革

林書揚經由對西方民主正本清源的探究之後，特別向社會多數的勞動群眾提醒，必須警惕資產階級專政下民主制度及其運作的虛偽性，也就是有必要爭取屬於大眾的實質民主。民主政治與社會運作之間存在有機的關係，當前社會所出現的種種矛盾與問題，相當程度是根源於資產階級統治者所壟斷的政治權力對民主的背離。「新民主論壇」的號

召、誕生與運作，即是奠基於上述林書揚對於既存民主制度的批判以及未來進步的理想。站在勞動大眾的立場，林書揚與新民主論壇所訴諸的對象是缺乏實質民主、被形式民主所支配的群眾，運作具有相當的現實性，議題緊扣當時的政治社會困境，將論壇的工作定位為思想啟蒙的運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引領勞動大眾對當前施行的民主制度進行自覺與批判，擺脫「民主」迷思。

「新民主」的名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毛澤東在 1940 年所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論渡海來台，成為影響 1950 年代台灣地下黨人投入革命的重要理論。新民主論壇與新民主主義論在聯合的對象、方法手段、歷史階段、國內外局勢條件等方面都有明顯的差異，但林書揚本人則強調兩者的目的都含有促進**社會變革（改革質變）**的意義。嚴格來說，林書揚所推動的新民主論壇，並非單純只是想要引領台灣社會的勤勞大眾擺脫「民主」的迷思，而是要藉此達到社會變革的目標，對抗由本土新興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理人聯合而成的「新的壓迫者」，林書揚稱之為「初階的再起運動」。

三、台灣民主實踐被忽略的視角

對林書揚而言，「新民主」並非「尖銳的急進色彩的用詞」，而是「透露出當前台灣社運的一般的上限意識」。他將新民主論壇定位為「自覺與批判的思想啟

蒙運動」，但這場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一樣，都受到社會其他價值的限制，從而無法更尖銳、更直接地突破原有社會結構。新民主論壇歷次的活動，幾乎都是與當時各種政治與社會運動進行回應、對話與批判，不只簡單地反映了林書揚對民主的理解與理想，同時也透露了台灣民主的實踐過程中，必須先突破的種種限制與矛盾。

（一）階級論的視角

無論歷次新民主論壇的主題為何，林書揚在致詞時總會提出該次主題與台灣勤勞大眾的關係，特別關心政治經濟局勢的變動對勞動大眾所造成的影響。林書揚指出，勞工階級佔台灣人口的多數，但因階級的弱勢，不只難以獲得民代公職的席次，也難有自救的途徑，最終的政治利益只能由少數的掌權者所把持，在既存民主制度下，勞動大眾的權利率先被讓位、被削減。

站在勞動大眾立場的關懷，反映了林書揚從馬克思主義出發，對於階級論與強調工人階級優先的堅持。林書揚指出，各種階級階層在社會中必須有合理的位置，奉獻與酬報、投入與回收也必須平衡公正，因而他反對「籠統地把凡不屬公權力結構，而成為公權力行使對象的一切團體和個人，都歸納為民間社會」。簡言之，無分階級地過分強調「公民社會」，將之視為整體，無法認清各階級及其代理人之間的關係，如此便會加

深鞏固原有的社會內部結構，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間的權利關係更加難以撼動，社會各領域叢生的矛盾與問題隨之失去解決與進步的根本可能。

（二）兩岸關係的視角

兩岸關係有其歷史脈絡，林書揚指出兩岸問題的本質，在於上個世紀中國內戰的延續，又加上東西冷戰的國際結構，使得兩岸問題從軍事對抗再轉化為政治對立，以及島內的統獨認同爭議，成為歷史現階段的主要矛盾，並內化於台灣社會對於政局穩定「決定性影響作用的最大因素」。

兩岸關係左右了台灣內部的政經與社會動向，但林書揚特別提醒了兩岸關係的隱蔽性。由於長年以來台灣對大陸的封閉，導致一般民眾出現規避大陸事務的心態，從而對於影響台灣社會甚深的兩岸因素，「不予以應該的注意和關心」，形成「嚴重的認識缺口」。兩岸的問題是歷史造成的結果，必須以歷史的視野加以解決與化解。歷史性的重新認識兩岸關係，不只有助於兩岸衝突對立的和緩，同時也有助於解決台灣內部的矛盾問題。

另一方面，在兩岸邁向經濟整合的過程中，林書揚並不反對兩岸經貿統合，但更關心台灣的勞工所遭受到的衝擊。林書揚指出，由於勞動大眾的弱勢地位，導致他們在兩岸議題上表現的冷

漠、消極或是迴避，因而他呼籲：「勞工大眾還是要自覺地掌握身為公民、選民的一份權利也是一份義務，積極地面臨、投入一種關係到社會整體的政治的抉擇行為」。從勞動大眾在兩岸關係之中的權利義務出發，兩岸對立與對抗關係的和緩，將會是台灣社會內部穩定與否的關鍵要素；兩岸經貿交流也應該正常化，並從其中建立新機制，共同保障勞動大眾的實質權益。

（三）美國的角色與東亞的視角

同樣由於歷史的因素，戰後台灣政治、軍事、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各方面的運作，實質上受到美國極高程度的制約，至今依然，即如林書揚所觀察的：「實際上以美國的國家意志為決定性因素之一，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當台灣自 1950 年代被編入美國在東亞的「集體安全體系」之後，再加上兩岸的對抗，台灣與美國之間遂成為「受保護者」與「提供保護者」的關係。台灣在美國巨大的軍事保護下，兩岸關係當然也隨之受到衝擊，台灣以「安全」為名，不斷向美國採購高額的軍事武器，不只造成財政上的負擔，也導致勞動大眾在資源分配中受到擠壓。對美軍購為台灣社會與弱勢人民造成的傷害，正如林書揚所警惕的：「對經濟整體運作系統中，擴大再生產的關鍵性環節的無盡耗損，台灣究竟能承擔多久」？

台灣與美國之間的軍事扈從關係，

同時影響著兩岸關係的穩定與安全，也影響了台灣社會多數群眾實際的福利與權利，制約了台灣民主政治與社會的正常運作，更壓縮了人民的自主空間；屬於台灣社會的利益，也必須讓位給美國「國家利益」。但這個問題不只是台灣獨有，同在東亞地區的韓國與日本，由於地緣的因素，同樣被美國編入軍事安全體系之內，與台灣面臨相似的現實處境與政治困境。林書揚即指出：「正因為對美關係的基本重要性如此，有關美國的國家性格、國家行為的特質等的認識，對三地人民的緊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林書揚強調三地人民之間的相互學習與支援，共同面對各自內部政權對美國的高度依賴，認識美國這個單極超霸國家對自身的干預，才有助於提升人民的自主性。

以上三個視角說明了，若是忽視屬於台灣自身的歷史與現實脈絡，西方自由主義式／資產階級形式民主體制在台灣運作過程中，所導致的種種矛盾與困境，非但難以被察覺，更難以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台灣的民主實踐，應該回歸到自身的主客觀條件。

四、結語

有效且穩定的民主制度運作，勢必相應於自身社會的歷史與客觀條件。台灣有來自自身社會的政治社會問題。同時，台灣的民主政治運作，又受到兩岸關係與美國干預的高度制約。兩岸關係

的對立或和緩，牽引著台灣社會內部的動盪或穩定，也影響著多數群眾的權利。而美國對台灣政治的介入，則使得人民自主性被迫壓縮。而上述的種種問題，又必須回顧近代的歷史才能得以理解，特別是兩岸在中國內戰與東西冷戰結構中的處境，例如新民主論壇的第一場活動，就是從白色恐怖之下，60、70年代台灣的政治案件談起。若是缺乏了歷史性的視野，單從學術上的民主理論，或是形式程序上的民主制度來看待台灣的民主及其實踐，便很難找到問題的根源。

林書揚先生在1988年的〈翻案的道理·道理的翻案〉文章曾指出，對於社會公意來說，「權是手段，而人民福祉才是目的」。當前的政治運作，是「將權的把持隱為真正目的，而藉人民之名加以掩護。亦即，把目的變成了工具」。林書揚先生也說，「人民才是政權的母體」。林書揚先生及其推動「新民主論壇」所持的階級立場，使得論壇成立的初衷即反對少數人掌控的「特權民主」，從而歷史性的、階級性的批判與反思時下的民主價值理論，希望透過歷次論壇活動的舉辦，喚起台灣民眾對「民主」的重新認識，進而追求屬於人民立場的「普遍民主」，促成推動社會變革的契機。當前台灣社會亟需的，即林書揚所強調的：「把被顛倒了的目的手段，重新翻回應有的位置上」，「重建一種新的政治倫理」——這是林書揚及新民主論壇所帶來最

重要的啟發。

參考文獻

- 《勞動前線》編輯部編，2006，《新民主論壇資料集（2002-2006）》，台北：新民主論壇。
- 林書揚，2010，《林書揚文集（一）歷史與人物：回首海天相接處》，台北：人間。
- 林書揚，2010，《林書揚文集（二）史觀與批判：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台北：人間。
- 林書揚，2011，《林書揚文集（三）統一與自決：有了統一才能自決》，台北：人間。
- 林書揚，2012，《林書揚文集（四）勞動與團結：勞動者，團結起來！》，台北：人間。
- 邱士杰，2012，〈試論林書揚先生的基本思想〉，「不屈的鬥魂：林書揚追思紀念暨文集發表會」論文（11月17日），林書揚先生追思紀念籌備會主辦，台北：國立台灣大學集思會議中心。
- 邱士杰，2013，〈「他終於全都是革命」：記林書揚先生〉，《人間思想》，3：4-50。
- 張鈞凱，2013，〈「民主」內涵與實踐的再認識：以林書揚與「新民主論壇」為思考契機〉，「2013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重返民間：從規範性論述到在地歷史解釋」（子題：「台灣人民左翼運動的歷程、頓挫，與超克：20世紀以來的運動者及其思想」）論文（10月5日），台灣社會研究學會主辦，台北：世新大學管理學院國際會議廳。

張鈞凱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林書揚先生與「東亞 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 國際研討會：民族主義 與民主主義的課題

徐 勝
簡宇敏譯
臧汝興校

I. 與林書揚先生的相識與共鳴

與林書揚先生的相識，是我在出獄後的1990年7月，地點位於京都某咖啡店內。當時林書揚先生向我說明，「從岩波書店《世界》刊載的〈徐兄弟獄中家書〉（徐京植作）得知徐勝兄弟事蹟」。其實，我在獄中一直思考，台灣應該如同韓國一樣，存在不少政治犯。林先生在《從二·二八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

自序（1992年6月）中談到我們兄弟，其中特別論及1988年甫出獄的舍弟徐俊植，對我們兄弟來說可謂殊榮。書中，林先生為俊植的出獄道賀，也說明了台灣與韓國政治犯之政治、歷史共通性：

1989年，南韓的著名兩兄弟政治犯——徐俊植、徐勝的故事，由幾位日本朋友介紹到台灣來。他們拿一篇剛出獄的徐俊植君的文章給我看，還建議我應

該以一個台灣的長期國事犯的身份，也寫一篇類似檢討比較台灣南韓這兩個實質上處在軍事統治下的地區的政治犯問題。(中略)

台灣與南韓之間，一般意義上的「國情」的差異不少。但在基本的社會結構和政權的根本體質方面來說，兩者具有相當多的類似點。尤其兩者都曾經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直接受害者，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也繼續受其餘毒，被迫承擔民族分裂國土分斷的痛苦現實。

有關韓國與台灣的相似點，林書揚先生舉出，兩者均是：(1) 日本帝國主義的直接受害者；(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深受其餘毒，苦於民族分裂。這便是1997年起6年間展開的國際研討會——「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運動之基本問題意識。同樣歷經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支配，韓國與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背景下，面臨民族分裂的悲劇，苦於殘忍無道的反共軍事獨裁政權遂行虐殺、下獄、拷問、監視等國家暴力罪行。

1994年3月，我與杉原達教授首次拜訪台灣，獲得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全面支援與導覽，我們足跡縱斷台灣，踏遍馬場町至綠島等「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受難現場。自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結成以來，他們不斷要求台灣政府對於政治受難者的名譽恢復、真相探究與補償。1993

年5月，在六張犁公墓發現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埋屍處，成為一大新聞，然而卻沒有獲得台灣社會與多數人的特別關心。為了幫助台灣政治受難者，正訪台的我們因而打算舉辦國際研討會，以喚起國際輿論，進而給予台灣社會意識全力一擊。恰巧當時韓國對於光州市民虐殺事件的加害者——全斗煥、盧泰愚兩位總統進行審判；「光州民主化運動真相追究、名譽恢復法」制定後，對於解放（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後軍事獨裁政權虐殺平民問題的關心與批判，亦不斷高漲。有鑒於此，透過還原冷戰時期國家恐怖主義之真相，以恢復政治受難者之權利，同時以民眾之手奪回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支配東亞之霸權，構思民眾連帶合作的可能性。1997年的第1次台北研討會，可說是其實現。

II. 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

以下是針對「國際研討會」運動的經過與成果之簡要整理。

國際研討會「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以下簡稱「國際研討會」）為一民間主導的大規模國際研討會，自1997年台北第1次大會起，至2002年秋季韓國麗水第6次大會為止，網羅了包括日本、韓國、台灣、沖繩的活動家、研究者、受難者、藝術家等，倡導改變現今「以美日為中心的東亞區域秩序」為「以民眾為中心的東亞秩序」。

1. 所謂東亞冷戰究竟為何？

一般所稱的冷戰，終結至今已過 15 年。世界性規模的資本主義陣營與共產主義陣營，在政治、思想、經濟、文化等層面處於極端的對立構造——此一意義的冷戰，意外地由於蘇聯的「國家自殺」而解體。然而，就如同今日伊拉克戰爭所示，萬惡之源為共產主義，一旦蘇聯解體，「歷史終結」，衝突對立將要消失——此一非歷史性的「自由民主主義勝利」論，已宣告破綻。國際政治的兩極對立構造雖不復存在，冷戰下披著「守護自由民主主義」羊皮的帝國主義本質，業已暴露無疑。處於資本全球支配頂點的美國軍事霸權構造，致使較冷戰時代更為殘酷的軍事主義（Militarism）與「戰爭的全球化」現身。

然而，另一方面，自上個世紀末起，揮別「戰爭與暴力的 20 世紀」，邁向世界性的和解、合作之時代潮流，也逐漸明朗。韓國、台灣等地，展開民主化運動與清算過去歷史；半世紀以來，做為冷戰最前線、持續暴露於戰爭危機的朝鮮半島，2000 年南北首腦會談實現了歷史性的民族和解。即使如此，布希軍產政權為追求世界軍事霸權與「軍需產業」利益，一面烙印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為「惡之軸心」、「流氓國家」，一面則製造東亞緊張與戰爭危機，阻礙此地和解、合作之展開。美國霸權主義式的干涉，可說踐踏了近代以來東亞民

眾追求「自己的命運由自己主宰」之權利與和平宿願，也透露出 19 世紀以來的東亞政治型態基本維持不變的情況。

換句話說，近一百數十年來，東亞政治型態雖內含階級、身分、性別等矛盾，卻是在「帝國主義」對「民族解放鬥爭」的對抗軸線上成形。這皆因於西方帝國主義列強，與模仿西方、化身為帝國主義的日本之東亞侵略、殖民地支配與戰爭。其中，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破壞與殺戮，可謂對東亞民眾的最大災劫。也正因為如此，日本帝國主義之敗亡，為東亞民眾帶來莫大希望與歡喜。然而，東亞卻遭冷戰、分裂的鐵幕阻隔。在美國的支配圈底下，理應受解放的民族主體——反帝民族解放勢力，遭到無情鎮壓，新的社會建設之展望與努力大受打擊。相對地，由於美國的戰略意圖，以加害者的天皇為首，日本戰犯獲得免罪符，大日本帝國的諸多犯罪亦不予追究，上演了歷史之逆轉。由於天皇制存續，日本與過去的訣別成為幻影。另一方面，東亞的舊日本統治機構或親日派人士，穿著「反共」的隱身衣沉潛，抑或再度復出。這個戰後出發點的蹉跎，是東亞民眾新的受難之始。

「1945 年朝鮮南部小村，即使只是想為母國『獨立』而參與的（人民委員會）小活動，……受社會主義影響而組織的東亞民族解放運動，遭（美國）徹底暴力鎮壓。」林哲對朝鮮半島冷戰與

國家恐怖主義的起源，有著以下說明。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初期，殖民地時期以來的新民主主義理念——亦即立基於社會諸勢力的統一戰線、以朝鮮獨立為目標的民眾解放運動——必須面對以警力、軍事力為支柱的政治暴力之全面行使，……帶來無止盡的政治、暴力的鎮壓與殺戮。濟州四·三事件、麗水·順天叛亂、游擊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量流血與死亡，都是在戰後 1 年內拉開序幕的。」

一般認為，歐洲冷戰從 1947 年開始；然而在東亞，則是以 1945 年朝鮮半島的分裂與美軍進駐為起點，隨著國內戰激化升溫，至韓戰達到頂點。

「亞洲冷戰是相互不信與結構暴力的體系化，也意味著在南北分裂、朝鮮人民的犧牲下所構築的秩序。……以朝鮮半島為起點的亞洲冷戰體制，使美國得以正當化鎮壓亞洲民族解放鬥爭，同時也確立了日本之於美國的從屬構造。」

（顯顯厚《軍縮問題資料》2004.1。29 頁）此一論點可說釐清了朝鮮半島與東亞冷戰的本質。也就是說，東亞冷戰雖披著意識形態的外皮，其實是以帝國主義與民族解放鬥爭的對立構造為基點。

因此，東亞的美日霸權以及其所支援的各地（軍事）獨裁政權欠缺正統性，這些少數人的反動式統治政權，不過是以國家恐怖主義赤裸裸的暴力來維持罷了。

2. 東亞的國家恐怖主義

1948 年，標榜自由民主主義的大韓民國成立，直至 1987 年「六月民主化抗爭」為止，基本上是「以法之名的恐怖主義支配時代」。在臺灣，因國共內戰敗北出逃台灣的蔣介石，在冷戰與內戰的「重戰」下，1950 年起企圖半永久化戒嚴，直到蔣介石死後 10 年、1987 年完全解除戒嚴前，持續遂行「白色恐怖」統治。沖繩在 1972 年本土復歸前，受美軍軍政統治，復歸後亦持續軍事基地化。如同楚邊通信基地土地徵收一例所示，沖繩本質上受「超法規式」的支配，擔負基地的沉重壓力。即使在日本，1952 年前的美軍占領期，「赤色整肅」或對在日朝鮮人的國家恐怖主義，亦可謂肆行無忌。美軍占領期結束後，日本對內高揭「和平與民主主義」，對外則成為美國的軍事基地。作為美國對東亞的戰略尖兵，日本透過軍事威嚇，迴避對東亞的過去清算，成為一個擁有「雙面臉孔」的「半戰爭國家」。

在韓國，由於美國的支配與朝鮮半島分裂、國家保安法體制之下，從 1948 年「濟州四·三事件」¹³至 1980 年「光

¹³ 1948 年 4 月 3 日，濟州島——位於朝鮮半島西南方的最大島嶼——當地民眾為反對美軍政府與李承晚欲建立朝鮮半島南部單獨政府、而預定於 5 月 10 日舉辦制憲議會選舉，憤而起義。游擊部隊高唱「反對單獨選舉」，施加攻擊，共 14 處警察署遭襲擊；對此，美軍與政府軍徹底掃蕩。在軍隊的殘酷鎮壓下，超過當時島上人口的 9 分之 1、高達 3 萬多人遭虐殺。

州虐殺」，國家暴力無情虐殺、鎮壓平民，集中於韓戰前後的犧牲者據說高達100萬人。台灣則以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為發端，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虐殺事件中，數萬民眾遭到殺害。

1980年代，國家暴力的「重大人權侵害」，成為台灣、韓國反獨裁鬥爭的中心議題而登上舞台。90年代，有關大量虐殺事件的真相追究、名譽恢復與賠償運動，立於民主化運動前頭。

在韓國，1990年有關光州虐殺事件的名譽恢復、賠償法之制定，在冷戰、分裂國家體制的銅牆鐵壁上敲出一道道裂縫。此後，透過1999年9月AP通訊社報導，韓戰期間美軍虐殺平民的老斤里事件，受到舉世注目，並使「韓戰前後平民虐殺事件」的真相追究與名譽恢復、賠償法制定正式排入議程。同年底，國會通過「濟州四·三事件真相追究與犧牲者名譽恢復相關之特別法」、「民主化運動相關人士名譽恢復及補償法」、「可疑死亡事件真相追究特別法」等法案。2004年，「日帝強占下強制勞動犧牲等相關之特別法」、「東學農民革命參與者名譽恢復等相關之特別法」、「老斤里事件犧牲者審查與名譽恢復相關之特別法」、「全斗煥政權下以「馴化」之名強迫一般市民進行非人道訓練的「三清教育（流氓管訓）受害者補償法」、「日帝強占下親日、反民族行為真相追究特別法」等，過去歷史清算法案相繼成立。雖然

「韓戰前後平民犧牲真相追究、名譽恢復法」最終成為廢案，然而目前包括數十件過去清算法案與請願正在進行，改革派占多數的國會應會加速立法。

在台灣，1995年制定「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譯注：現「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1998年國會通過「五〇年代白色恐怖」¹⁴賠償、名譽恢復法——「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持續進行補償與紀念活動。

回顧戰後日本軌跡，杉原達指出，台灣、韓國的恐怖政治，都歸咎於日本的一貫支持與援助。杉原表示，日本政府「第一，對於獨裁政權政治面、經濟面的支援，意味著承認其政權對民眾之壓迫；第二，藉此換取免除殖民地支配與戰爭責任之追究，隱瞞過去；第三，透過依附獨裁政權進出當地市場，得以強制奪取、榨取當地民眾。」而日本人在「冷戰體制與經濟高度成長體系」下，經濟穩定成長，人們「與國家、企業自我同化」；經濟安定受到保證下，人們「忘卻省察歷史，也迴避正視同時代鄰近民眾之現實」。也就是說，日本作為冷戰時代的東亞國家恐怖主義共犯，與其他地區的民眾、民族相互對立。

¹⁴ 台灣「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指在1949年至1987年蔣介石、國民黨主導下的鎮壓事件，主要集中於1950年至1954年韓戰期間，共4-5000人遭處決、15000人遭判入獄。

3.東亞國際研討會之成立

「國際研討會」的構想，始於 1990 年 7 月筆者出獄後，透過杉原達的介紹，與身陷囹圄 35 年的台灣前政治犯林書揚相識。我在獄中也曾想過，「如同反共獨裁國家韓國，台灣應也存在被囚禁的政治犯」，與林先生相識則證明了我的想法。之後在 1994 年，我與杉原先生一同受邀至台北，跟隨政治受難者的足跡，探訪綠島政治犯收容所遺跡、新店軍人監獄等地，並開啟了舉辦國際研討會的構想。

1997 年 2 月，為紀念「二二八事件」50 週年，第 1 次國際研討會以「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為題，於台北舉辦。戰後，台灣納入國民黨支配，實施長達 37 年的戒嚴，自由與人權的壓迫成為日常。1986 年戒嚴令解除，與冷戰解體時期交疊，台灣民主化運動急速展開，「二二八事件」、「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等蔣介石政權下重大的人權侵害問題開始受到重視。1995 年雖制定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則尚待解決。為喚起公眾關注，要求台灣政府加速補償法之制定，因而在台北舉辦研討會。研討會參加者包括來自台灣、日本、韓國、沖繩等地 300 多位學者、活動家、藝術·文化界人士、政治受難者等，其成果則包括上述的「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之制定。此外，透過此次研討會，我們也了解到命運的共通性——冷戰下

國家恐怖主義的犧牲者並非只有台灣，因此決議延續舉辦研討會並設置共同事務局。

1998 年夏，以四·三事件 50 週年為契機而召開的第 2 次濟州大會，以「由民眾來解體冷戰、實現東亞區域和平」為理念，聚焦於「濟州四·三事件」的真相追究與受害者賠償、名譽恢復，可說是戰後韓國最大規模、共 450 人參與的民間研討會。其成果是 1999 年 12 月「濟州四·三事件真相追究、名譽恢復法」之制定。

1999 年秋，第 3 次沖繩大會則以「美日冷戰政策與東亞和平、人權」為題，以東亞美軍與美軍占領期的沖繩等諸問題為焦點，同時探討名護直升機坪移設預定地的文化活動、田野調查等當前課題。

2000 年的第 4 次光州大會，為紀念「光州事件」20 週年，以「復活光州：統一與東亞和平」為主題，由全南道廳前廣場聚集數萬名群眾的前夜祭活動拉開序幕，為國家暴力的受害者成功取得賠償、恢復名譽，檢驗欲化身為世界人權都市的光州經驗。

2002 年 2 月，第 5 回京都大會以「東亞冷戰、國家暴力與日本」為題，聚焦於韓戰前後日本的反戰運動與美軍鎮壓。同年恰巧是在韓戰背景下、作為亞

洲冷戰基礎的美日安保條約與舊金山和約生效 50 週年，因此以韓戰為中心焦點，探討戰後日本的「和平與民主主義」至赤色整肅等急速「逆行路線」之轉向，以及與之對抗的反戰、和平之民眾鬥爭，也揭示了韓戰、東亞冷戰下日本所扮演的角色。

同年秋，第 6 次麗水大會則以「虐殺、清算、和解」為主題，將過去因「赤共」軍事反亂事件而遭蔑視、封印的麗順（麗水、順天）事件，使之成為輿論話題；以韓戰前後平民虐殺問題為中心，檢視大規模人權侵害的歷史事實，並以立法人權救濟為目標。

透過每次會議，「國際研討會」發展出下列歷史認識與運動的方法論。首先，「東亞」是近代以後成形、以日本為中心的地區秩序概念。1945 年日本帝國主義雖敗北，由於美國冷戰戰略，日本霸權受美國庇護，從屬、依附於美國並得以延命，致使「東亞」持續維持以美、日為中心的地區秩序。因此，若從帝國主義霸權與民眾鬥爭的對抗關係之觀點來看，東亞戰後史 60 年與戰前是連續的。除社會主義圈地區，美日的東亞支配繼承了舊日本帝國版圖「全區域」；另一方面，被支配民眾則受「分裂統治」。以舊親日派為核心、不具正統性的各地反共獨裁政權，在美、日支援下，依國家恐怖主義手段遂行恐怖統治，虐殺、鎮壓多數民眾。因此，東亞民眾運動的

戰略方向，應從以美、日為中心、霸權主義式的區域秩序，轉換為以民眾為中心的區域秩序——自民族與民眾的自我決定權得以自由行使，實現和平、人權、繁榮。為此，應從東亞同時代的相互關連出發，探討具體、多樣的民眾生活史，發掘冷戰、分裂體制中民眾犧牲之具體事例，救濟民眾的個別利益，恢復其權利，使之得以在歷史中正確定位，迫使冷戰（帝國主義霸權）解體。「國際研討會」便是由此問題意識出發，將民眾虐殺事件、國家恐怖主義設定為中心課題。

運動成果不僅包括上述的補償法之制定，還包括：（1）透過 3-400 人規模、前後 6 次民間國際研討會，累積達 150 篇論文，建立東亞年輕研究者網絡與民眾連帶合作；（2）提倡且實現學術研討會、受難者證言、田野調查等三位一體的新型態國際研討會；（3）除舉辦大型研討會外，其間更組織學習會、演講、田野調查等，使運動日常化；（4）作為民眾自律、獨立參與的運動，貫徹自費負擔原則，以參與者的高貴犧牲與使命感推展運動；（5）除準備資料與報告集之外，各種言論或通訊、網際網路等，以日、韓、中三語言持續公開成果，累積共同運動之經驗；（6）雖遭遇不少困難，排除作為國際會議共通語言的英文，持續使用東亞三語言發聲等，可說是「國際研討會」之運動成果。（後略）

¹⁵

¹⁵ 徐勝編《東アジアの冷戦と国家テロリズム：米日中心の地域秩序の廢絶をめざして》（御茶の

基本上，上述「國際研討會」提起的情勢分析與問題，至今仍然有效。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弊害，已蔓延至包括中國本土的東亞全體。在貧富差距與貧困的不斷擴大中，年輕人與多數人民已失去希望，徬徨失措。我認為，東亞人民在面對帝國主義者與獨裁者構築新的抵抗據點時，「國際研討會」的精神與經驗是十分可貴的。

Ⅲ. 林書揚先生與「國際研討會」

林書揚先生對於「國際研討會」之貢獻，可以整理如下：

1. 林書揚先生成功地舉辦第 1 次台北「國際研討會」，構築了「國際研討會」運動之基礎，為運動著先鞭。
2. 由於台北「國際研討會」之成功，有關台灣戒嚴時代的國家暴力清算活動亦獲得極大成果，為台灣地區政治受難者取得名譽恢復與真相追究、補償。
3. 林書揚先生曾回憶其思想為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那正是對抗反共與分裂——東亞帝國主義統治意識型態與手法——的人民意識形態，同時也指引了「國際研討會」方向。
4. 林書揚先生率領、指導台灣參加團參與第 1 次至第 6 次的「國際研討會」，可謂為台灣、韓國、日本、沖繩地區代表的全體運動之部分建立良好基礎，對全體運動的成功盡了極大貢

獻。

5. 透過「國際研討會」，林書揚先生對於東亞政治受難者、活動家、研究者的國際交流與連帶合作獲得很大成果，並得以發展反對東亞美日霸權主義的國際運動。
6. 透過第 4 次光州「國際研討會」等會議，林書揚先生對於韓國堅持良心自由的「非轉向」政治犯與台灣政治受難者的交流與相互認識得以更為深入。
7. 林書揚先生以寬仁溫厚的人格與一以貫之的高貴政治理念、進步思想，成為「國際研討會」參加者的模範，令人深深銘刻在心。

回想林書揚先生的事蹟，林先生對於「國際研討會」參加者的人格、思想、運動等貢獻與感化，可謂十分深遠。如今林書揚先生逝世即將屆滿一週年，我們除了為故人祈福，在林書揚先生靈前高揭「國際研討會」的思想與精神，並在此約定：人民尚未成為世界主人翁，同志仍須努力。

徐勝서승
日本立命館大學法學院教授



林書揚先生與徐勝先生（黑框眼鏡者）等東亞各國政治犯在一起



林書揚先生在韓國

與美日帝國主義的 侵略與控制作鬥 爭：AWC 運動的歷史 及意義

迫田英文

張增榮譯

一、緣起

我們於 1990 年初與林書揚同志及台灣勞動黨和勞動人權協會的諸位同志首度見面。此後，在與美日帝國主義侵略與控制的共同鬥爭中，我們學習到很多。1995 年我們首度訪台時，林書揚同志以《日帝百年侵台史》作為題目，做了演講。這是對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殖民地支配開始 100 年間、對日本和台灣的歷史考察。透過這場歷史介紹，我們學習到了台灣勞動者和人民鬥爭的歷史及其所面對的問題。這都是我們珍貴的資產，我並且深深地學到了林書揚同志 34 年 7 個月的獄中鬥爭，尤其是奮鬥貫

徹而不屈的精神以及他的生存方法本身。

現在，我與包括台灣在內的亞洲各地的同志，共同推進的「全亞洲反對美日帝國主義侵略與宰制運動聯盟」（AWC）的鬥爭，亦是林書揚先生終身所堅持的反帝國主義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思想與精神的轉化。在此將 AWC 運動的經過與意義作一概括，並將林書揚同志所作的貢獻在此提出。

二、AWC 的結成及其經過

1992 年 10 月，亞洲各國、各地域的

人民運動代表在日本集會，召開了國際會議。4天的會議後，此次會議的參加者決議成立AWC，以反對美日軍事同盟與自衛隊向海外派兵，自那時起，AWC反對美日帝國主義侵略的國際共同鬥爭和人民運動間的互相支援，持續鬥爭了20年。

AWC是從巨大變化的國際及亞洲情勢中運動出發的。1991年由於蘇聯崩壞的影響下，美國帝國主義以促成「新世界秩序」為幌子，強力策動單極支配世界的策略，其影響深及亞洲各地。1992年日本帝國主義更以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PKO）為由，竟在二戰戰敗後再度派兵亞洲。AWC的發起，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情勢下，對美日帝國主義所做出的反擊。在結成的過程中，林書揚同志強力支持AWC的目的和意義，其後也在台灣為團結和促成亞洲範圍的人民運動而盡力。

在1995年第二次總會，AWC將其名稱改定為「全亞洲反對美日帝國主義侵略與宰制運動聯盟」，明確宣告聯盟將團結亞太地區被帝國主義宰制的人民和團體，以超國界的共同鬥爭為目的，形成國際連帶的組織活動，反對帝國主義歷史的、現行的侵略與宰制。

AWC現在正式參加的團體有中國台灣的勞動人權協會、AWC韓國實行委員會、菲律賓新愛國陣線（BAYAN）、印尼文化活動家網絡（JKB）以及AWC日本連絡會議。2001年美國反戰團體「現在行動

起來停止戰爭和終結種族歧視」聯盟（A. N. S. W. E. R.）也參加了我們的組成。我們的運作皆以「所有會員間的平等」、「依同意的決定」和「互相之間的獨立性」為原則。大概每年召開一次幹事會議（CCB），討論面臨的情勢，確認共同鬥爭的方針。最近一次的幹事會議，在中國勞動黨及勞動人權協會的努力下，在台北成功召開。

三、AWC的共同實踐

在反帝的旗幟下，各地的人民群眾團體在各種領域累積了共同實踐經驗。

第一、我們以各國、各地域的鬥爭為基礎，組織並推進了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國際機關為共同鬥爭目標的國際活動。1996年，菲律賓新愛國陣線（BAYAN）在馬尼拉所發起的反對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的國際共同鬥爭，是這個運動的先驅。新自由主義的破滅性在1997年亞洲爆發的通貨危機、2008年美國金融恐慌以及世界同時的不景氣中再度暴露出來。AWC於2005年的香港世界貿易組織（WTO）反對鬥爭、2008年北海道洞爺湖八國高峰會議（G8）的反對鬥爭、以及2010年橫濱APEC的反對鬥爭都無役不與。

第二、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反對鬥爭。針對以美帝為首侵略阿富汗及伊拉克的戰爭，AWC各連帶團體在各地向美國大使館和辦事處連帶發動了街頭示威

遊行，也對支持美帝侵略戰爭的各國政府做了彈劾鬥爭，我們也參與了抗議美國支援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聲援巴勒斯坦人民的行動。2013年9月，AWC各成員團體分別在台灣、菲律賓、日本及美國發動了反對美帝企圖對敘利亞的直接軍事攻擊策動的抗議活動。

第三、共同鬥爭推動美軍自亞洲全面撤退的實現。美軍及美軍基地的存在，是美國帝國主義宰制亞太地區的支柱。因此，AWC各參加團體聯合起來推動反對菲律賓的美軍再進駐、南韓平澤美軍基地的擴張及濟州島海軍基地建設、日本沖繩、岩國、神奈川的美軍再編以及基地強化等共同鬥爭。2013年7月，AWC與「Ban the Base」及國際人民鬥爭聯盟（ILPS）在馬尼拉共同推動了反基地的國際會議。

第四、AWC同時展開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大國化的鬥爭，並對內閣及保守政黨議員美化亞洲侵略戰爭、肯定殖民地宰制的作為發動彈劾鬥爭，要求日本政府對亞洲侵略戰爭的受害者謝罪，並給予國家賠償。安倍政權登場之後，藉著對歷史的歪曲，強化了日本在亞太地區政治、經濟、甚至軍事的影響力，這使得AWC的鬥爭更加重要。就在今年8月15日我們台灣的同志到日本交流協會舉行抗議活動的同時，AWC日本連絡會議在日本也同步行了反對8.15參拜靖國神社的抗議行動。

第五、AWC一貫支持朝鮮半島的自主和平統一及台灣海峽間的和解和平統一，並為了奮鬥。我們認為這是為亞洲太平洋地區創造恆久和平的重要課題，這一點在AWC總會及幹事會議的共同決議裡都有反映出來，因此，我們反對美、日、韓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戰爭挑撥、包圍及解體的攻擊。同樣的，我們談和美國對台灣出售武器，並為此與台灣人民聯合起來鬥爭。

第六、推動各國、各地區人民鬥爭國際連帶的組織化，相互交流、相互支援。AWC各團體參與及支持了推翻印尼蘇哈托政權、反對菲律賓艾若育政權政治殺害異議者（超過1000人）的運動。AWC始終都與各地的人民勞動者聯合起來與反動政權的彈壓、人權侵害以及資本攻擊作對抗。2012年AWC日本連絡會議參與並聲援了台灣華隆紡織廠勞工的罷工行動，在活動中我們有機會學習了解到台灣的情勢及勞動人民所面臨的問題。經過這些共同鬥爭與相互支援的積累，參加AWC的各團體得以加深相互的理解與信賴並進一步發展國際團結。

四、AWC運動的意義

AWC發起廿多年來的運動意義可以總結如下：

第一、AWC反對帝國主義政治路線是與亞太地區勞動者及人民的國際團結組織的存在相一致的，這和以資本國際化

為背景所形成的一般組織是有區別的。帝國主義的支配與壓制只要繼續存在，與之對抗的人民鬥爭聲音絕不會中斷。AWC 因其立足於人民的要求，而在政治上、國際上獲得了存在的意義。

第二、實踐性。通過各種各樣的國際會議或相互交流，得知別的國家或地區的狀況和人民的鬥爭而得到的學習，當然是有意義的，但要通過實踐的結論才能十全地發揮其意義。這一點如我們前面所述，20 多年來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宰制及人民抵抗抑壓的共同鬥爭，證明了我們是戰鬥的團體，這一實踐性格使得 AWC 別成一格而存在。

第三、AWC 運動是由各國、各地域的勞動者和人民為基礎所組織的階級運動。AWC 的各團體雖有大小之別，都是以農民、勞動者、或城市貧民為基礎組成而推進著各國各地域的社會改革運動。由於各團體的努力，AWC 運動獲得一定基礎的同時，也使此一運動代表著那一階級利益，而有鮮明的歷史性格。

AWC 這種運動在政治上、實踐上、階級上、歷史上的性格和意義是林書揚同志和我們共同追求的道路，尤其對人民鬥爭的歷史繼承這點，我們大大受教於林書揚同志。林書揚同志本身就是人民鬥爭史的直接繼承者。在結成 AWC 的討論中，林書揚同志向我們強調應由階級鬥爭的歷史觀點來考察其重要性，由此

對 AWC 的內容綱要作了很大的貢獻。

五、今日的亞太情勢與 AWC 的課題

今天我們可以由歷史性趨勢看到美國帝國主義的沒落。美帝雖然在阿富汗、伊拉克的侵略戰爭的軍方佔領中確實造出了親美政權，但由於現地人民頑強的抵抗鬥爭，對該地域支配政權的擴大企圖一步步地遭到挫折。巨額的戰爭費用壓迫著政府的預算，招致國家財政危機。當前突尼西亞和埃及人民的蜂起，美國對世界各地的控制已出現破綻。這是美帝歷史沒落趨勢中所出現的象徵。

但企圖重溫舊夢的美帝，為突破自身所面臨的危機所進行的軍事策動，是亞太地區勞動人民所面臨的重大課題。眾所周知，歐巴馬政權正以中國為最大目標的「再平衡戰略」，強化與日本、韓國和澳洲的軍事同盟，並飛躍地強化太平洋各地的美軍基地和美援。在經濟上推動「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企圖擴大以美國為主導的自由貿易圈，以此為主軸，美帝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基軸化」將深深的影響此地區勞動人民的生活與生存。

尤有甚者的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動向。安倍政權在美日軍事同盟的強化之下，更全力在整備日本自己的軍事體制。安倍政權現在正要變更憲法解釋，恢復其向來否定的集團自衛權的行使。

這將意味著日本軍隊將和伊拉克戰爭中與美軍並肩作戰的英軍一樣，可以和美國一起參與侵略戰爭和軍方介入的遂行。安倍首相曾美化侵略戰爭和殖民地支配，執拗地尋求著靖國神社的參拜。像這樣的日本帝國主義動向，引起了亞洲各地人民的憤慨，同時也擴大此地區的政治和軍事的緊張。

美日帝國主義要利用釣魚島、南沙群島等領土糾紛來正當化美日軍事同盟和美軍的進入，我們對此做強烈的彈劾。今年三月我們在台北幹事會議上，做出了如下的決議：「反對有關釣魚豬島和獨島的領土擴張主義」；「反對策動軍事緊張的美日帝國主義」；「要求對領土問題作和平的外交解決，反對激化緊張的美帝國主義的介入」。

六、結語

在這 20 多年的歷史中，我們也痛切地經驗了喪失多年共同奮鬥的亞洲各地同志。菲律賓五一工聯（KMU）長年的領導 Crispin Beltran 同志，新愛國陣線代表 Dan Vizmano 同志，AWC 日本聯絡會議共同代表齊藤一雄同志以及林書揚同志。其他尚有志業未遂而逝世的許多同

志，我們將結合我們反帝國主義鬥爭，作更強固的推進，來繼承同志們的遺志。

我們日本的運動者結合亞洲人民來解放的日本人民運動的重大責任，經常受到林書揚同志的叱吒激勵。現在在安部政權登場，日本帝國主義明確地與亞洲人民為敵，我們將會以林書揚同志所給我們的連帶厚意做為實行任務的決心。

強化亞洲太平洋地區勞動人民的國際連帶，共同向帝國主義侵略與支配的鬥爭必要性正與日俱增。另一方面，各國政府對 AWC 會員的入國阻礙以及對人民運動的國際結合、國際共同鬥爭的彈壓也正在擴大，但不管任何彈壓都不會阻礙我們的意志。我們將以團結與鬥爭來更加發展並衝破所有的彈壓。我們台灣以及亞太各地同志將會以打倒帝國主義、解放勞動人民為志業共同奮鬥！

迫田英文さこたひでふみ
全亞洲反對美日帝國主義侵略與宰制
聯盟國際事務局代表

歷史條件的成熟，往往要超越個人生命的單位長度，等到他們躑躅而行的路上不再寂寞時，他們都已步入中年。但幾次的路轉峰迴，不知覺間同行者漸眾，時代的指向既已顯明，則曾經沉潛於時代量變過程中的他們的人生價值，也快要重獲澄清了。到時，將是又一次的時光的轉折。

——林書揚

勞動者，團結起來！

我生長在舊殖民地的台灣社會，經歷了太平洋戰爭、台灣光復、中國內戰，我的青、壯年時期的三十四年全部在政治監牢中度過。回到台灣社會後，我發現這是一個掛著「中華民國」名號的新殖民地。在最近三十年中，看到台灣社會所發生的事件，有時候有機會加以評論；有時候掌握了台灣社會群體的時代意識，也會表達一些看法；對於台灣社會的有關改革與歷史變則，有時也不免作些解釋、闡述。現在把這些東西收集起來，作為個人文集出版，並非對自己文章的自誇。這些文章可視為台灣社會在跨世紀從舊殖民地到新殖民地轉變過程中的一點個人的記錄。

——林書揚

二十世紀以來台灣人民左翼運動史的軌跡與前瞻

林書揚文集 四卷本 平裝版

發售中

- 第一卷：回首海天相接處
- 第二卷：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
- 第三卷：有了統一才能自決
- 第四卷：勞動者，團結起來！



台北市萬華區長泰街五十九巷七號
[電話] 零二一三三七一零五六七
[傳真] 零二一三三七一七四四

人間出版社 出版發行

第一、二卷定價三百五十元·第三卷定價五百元·第四卷定價四百八十元

永不消逝的驚雷
林書揚先生著述與實踐研討會
——紀念林書揚先生逝世一週年——

＊

2013年10月27日（日）13:00-17:00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二樓202室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29號）
紀念林書揚先生實行委員會籌備會主辦